CEEM | China External Environment Monitor 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监测

总第 248 期 2022 年 11 月 30 日

全球智库半月谈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的出口管制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经合组织国家疫情后的劳动力短缺

卢拉能否解决巴西的问题

什么类型的资本流动有助于改善国际风险分担？

教育与创新的鸿沟

数字平台的“微捐赠”

数字生态系统的全球治理：保持融合和组织共存

本期编译 孔祥奕 廖世伟 刘 铮 宋海锐 熊春婷 薛 懿 张丝雨 杨 茜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承担的编译项目，每半月定期发布。所有稿件均系网络公开文章，由项目组成员依据当前热点编译组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宏观经济研究组

顾　　问	张宇燕			
首席专家	张　　斌		姚枝仲	
团队成员	曹永福	美国经济	陆　　婷	欧洲经济
	冯维江	日本经济	熊爱宗	新兴市场
	徐奇渊	中国经济	杨盼盼	东盟与韩国
	肖立晟	国际金融	李远芳	国际金融
	常殊昱	跨境资本流动	顾　　弦	大宗商品
	陈　　博	大宗商品	吴海英	对外贸易
	崔晓敏	对外贸易	熊婉婷	金融政策
	王　　地	宏观经济	张寒堤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召 集 人	徐　　进		**协 调 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 慧 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联系人：曾一智 邮箱：zengyizhi@mail.bnu.edu.cn

电话：(86)10-8519 5775 传真：(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4 邮政编码：100732

免责声明：

《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的出口管制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6

导读：2022 年 10 月 7 日，拜登政府突然限制向中国半导体公司出口某些设备和服务。该政策旨在抑制中国生产先进制程节点半导体的能力。Chad P. Bown 采访了前奥巴马政府商务部助理部长 Kevin Wolf，就 10 月 7 日的出口管制如何影响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上下游的美国和外国公司进行讨论。

经合组织国家疫情后的劳动力短缺 12

导读：劳动力短缺会影响经济活动，加剧供应瓶颈，并且引发通货膨胀。本专栏介绍了经合组织最近的一项跨国分析，这一分析表明，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劳动力短缺呈上升趋势，并往往集中在以接触密集型、低工资和更普遍的低质量工作为特征的行业。鼓励灵活工作安排、培训和适当薪酬的公共政策干预措施有助于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

美国就业和工资增长超出预期，美联储应对更加困难 17

导读：根据 11 月的就业报告，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张，就业和工资增长超出预期。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使美联储降低价格通胀的工作更加复杂。随着美联储核心消费者价格通胀（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 PCE 价格指数）进一步上升，美联储可能需要进一步大幅提高政策利率。

卢拉能否解决巴西的问题 22

导读：巴西总统选举在经历了近一个月的两轮投票后落下帷幕。劳工党领袖卢拉第三度当选，创造了拉美政坛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一次回归。现年 77 岁高龄的卢拉是巴西政坛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曾在 2003-2011 年间连任两届巴西总统，带领巴西实现了经济腾飞，却也是巴西军政府时期结束后唯一一位被捕入狱的总统。卢拉的就任仪式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举行。然而，胜选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卢拉上任后仍将面临多重挑战。

全球治理

什么类型的资本流动有助于改善国际风险分担？ 24

导读：跨境资本流动有望通过促进全球金融市场的借贷，改善国际风险分担。本文研究了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各种类型的资本流动（外国直接投资、投资组合股权、债务、汇款和援助流动）的风险分担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汇款和援助流动与日益增加的

国际风险分担有关。其他类型的资本流动与更好的风险分担结果并不一定相关。这些发现对不同的计量模型设定、国家特异性特征与其他控制变量是稳健的。

教育与创新的鸿沟 37

导读：高等教育项目对创新和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本文介绍了教育与创新之间的鸿沟，这是一个衡量教育内容与知识前沿之间距离的指标。在美国高等教育院校中，由更积极地开展研究的教师教授的课程，其教育与创新的差距明显更小。而在学生社会经济地位大多较低的学校中，这一差距更大。平均而言，接触前沿知识与学生成绩呈正相关。

数字平台的“微捐赠” 41

导读：“微捐赠”——一种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筹款模式——它允许慈善机构向许多个人征集小额捐款来筹集资金。本专栏使用阿里巴巴慈善捐赠计划的数据来评估微捐赠的可行性和参与者的潜在动机。作者识别了支撑微捐赠获得成功的各个因素：一是预期捐赠金额和寻找合适捐款项目的成本很低，二是捐赠者进行再次捐赠的比例很高，三是认可机制为捐赠者创造了小而有意义的激励。

数字生态系统的全球治理：保持融合和组织共存 50

导读：尽管一直有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数字经济全球治理的深度融合，但地缘政治摩擦和国家控制权的重新确立，正推动数字经济细分成为不同的子部分。本专栏概述了提高数字经济的效益和机遇并在全球层面应对监管和治理方面挑战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侧重于在线平台、数据、基础设施和数字贸易的全球治理，并围绕效率、兼容性、弹性和一致性等政策目标进行组织。

本期智库介绍 54

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的出口管制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Chad P. Bown， Kevin Wolf/文 杨茜/编译

导读：2022 年 10 月 7 日，拜登政府突然限制向中国半导体公司出口某些设备和服务。该政策旨在抑制中国生产先进制程节点半导体的能力。Chad P. Bown 采访了前奥巴马政府商务部助理部长 Kevin Wolf，就 10 月 7 日的出口管制如何影响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上下游的美国和外国公司进行讨论。编译如下：

2022 年 10 月 7 日，拜登政府突然限制向中国半导体公司出口某些设备和服务。该政策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旨在抑制中国生产先进节点半导体的能力。Chad P. Bown 采访了前奥巴马政府商务部助理部长 Kevin Wolf，讨论了 10 月 7 日的出口管制如何影响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上下游的美国和外国公司。

为了兼顾清晰和篇幅，本文进行了些许编辑。详细版本，请收听 2022 年 11 月 2 日的贸易谈判节目，或在此处[1]下载完整文字记录。

Chad P. Bown（下文简写 CB）：美国新政府上任的前 18 个月时间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

Kevin Wolf（下文简写 KW）：有观点认为美国新政府只是采用了特朗普政府结束执政前最后几天的政策，并在第一年、前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维持了这些政策。这并不是真的。

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几件事。作为一届政府，他们制定了连贯的叙事，将与中国有关的所有领域和其他问题都涵盖进去。其次，为了能够管理这个系统，政治官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就位。

第一年左右的时间只是维持特朗普政府任期结束时的局面。

CB：对于密切关注国家安全问题的人来说，他们从未觉得拜登新团队会简单地撤销特朗普政府的出口管制措施。这些出口管制措施包括那些阻止美国设备流向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以防止这家公司造出先进半导体芯片的政策。

KW：很明显，从本届政府成立之初，甚至在本届政府之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就对中国的先进节点半导体及其本身与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舰队的相关性存在根本性的国家安全担忧。

[1] https://tradetalkspodcast.com/podcast/170-national-security-semiconductors-and-the-us-move-to-cut-off-china/

对于那些关注人们写的东西的人来说，甚至在他们加入政府之前，作为政策问题，先进节点半导体和半导体生产设备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点一直很清楚。但这种变化究竟是什么，基本上是未知的。

拜登和半导体出口管制？有事要发生了

CB：随着拜登政府和对半导体的出口管制，一些重要的事情即将到来，但具体是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发生还不清楚。

在 2022 年的夏天，两件大事发生了。

KW：第一件是中芯国际已经开发出了 7 纳米级别非常先进的芯片。拜登政府明确表示，他们需要采取行动，迅速行动，以阻止中国芯片进步的进程。

第二件是，从各种迹象来看，中国对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反应非常令人担忧。这加强了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即通过出口管制和许多其他手段采取一些重大行动。

CB：中芯国际（SMIC）是特朗普政府为了阻止其获得制造更先进制程芯片的工具而列入实体清单的一家公司，但该公司还是在芯片领域取得了进展。

加之中国对美国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的大规模军事反应（台湾是一个“民主岛屿”，习近平曾表示希望将台湾与共产主义大陆统一）。上述两点相结合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奠定了基础。

9 月 16 日，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了拜登政府出口管制的国家安全目标。

他说：“在出口管制方面，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在某些关键技术上保持‘相对’优势这一长期前提。我们过去以前一直采用‘按比例增减’方法，称我们只需要领先几代人。这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战略环境。鉴于某些技术的基本特性，如先进逻辑和存储芯片，我们必须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

KW：当你不再仅仅局限于将国家安全解释成一个事物的时候，你就可以清晰地阐述什么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一个与武器、军事项目、经典的出口控制考量有着可识别关系的东西。

他在演讲中还非常明确地表示，随着技术的发展，“按比例增减”的时代已经结束。然而对于那些历史上被控制的事物，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是，在政策考虑中，只要我们在这个商业项目上领先几代人，那么这是可以接受的。他说这一规则结束了。现在的目标是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

10 月 7 日宣布的美国出口管制

KW：10 月 7 日的规则侧重于限制中国开发或生产四样东西：先进制程半导体，任何类型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先进计算能力和超级计算机。美国政府正在

通过使用管制物品清单、对美国人的活动进行控制，以及对进入特定中国公司的外国制造物品进行域外干涉，来实现这一目标。

CB：让我们从第一种先进制程半导体开始。

这是精致、小巧、快速芯片的生产。出口管制法规非常具体地规定了针对哪些类型的芯片——高级逻辑芯片，高级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和高级闪存芯片。

管制政策限制美国公司制造的顶级工具出口到中国制造半导体的工厂。

让我们试着梳理一下中国哪些公司受到影响，以及如何受到影响。

有许多总部位于中国境外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制造芯片，包括台湾台积电、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甚至美国的英特尔公司也仍有一家工厂正在被出售给 SK 海力士。

美国新的出口管制规则是否适用于这四家公司在中国的半导体工厂？

KW：是的。因此，该规则并未区分总部位于中国境外的公司或是总部位于中国境内的公司。

但拜登政府在规则中所说的是，将区别对待总部位于中国境内与境外的公司。

该规则相当明确，如果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境内的公司，那么关于先进制程半导体工作设施的任何出口或涵盖活动都将无法获得许可。没有任何例外，这家公司将无法从美国商品或美国服务中获益。

但是，如果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境外的代工厂，就会适用逐案审查政策。

CB：对于我们提到的在中国境内设有工厂的四家总部位于中国境外的跨国公司，将采取逐案审查政策。

10 月 7 日星期五公布了这一政策，但其中一些控制措施马上生效，外国公司需要许可证才能让这些在中国的工厂继续生产芯片。而这些许可证——大概是在逐案审查后确定的——并没有在 10 月 7 日随管制政策一起公布出来。

这些公司与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争分夺秒，但在控制措施生效之前，商务部已向这四家跨国公司发放了许可证，因此他们中的任何一家都不需要暂时关闭工厂。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许可证只有一年的事实，而不是十八个月或两年或其他什么时间？

这只是形式上的吗？一年后他们会再获得一年的许可证吗？亦或是说，这是一个信号，表明这些公司需要开始关闭在中国的工厂，并准备在一年内退出？

KW：没有定式，这一切都是全新的。记住，政策目标、目的、方法——关于管制政策的一切都是非传统的、非经典的。所以这一切都是当下制造出来的。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其中很多是外交的功能，是与盟国进行双边和三方合作的功能。下一步决定取决于很多方面，比如基于瓦森纳协定，是否可以利用多边机制对中国形成控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判断是什么，以及对中国本土能力的更广泛担忧。

我认为你唯一能从已经公布的一年授权中得到的信息就只有这是一个一年期的授权。这将是有趣的一年，看看会发生什么。

深度挖掘 10 月 7 日的规则

CB：拜登团队在 10 月 7 日宣布的出口管制与特朗普政府对中芯国际的出口管制相比如何？

KW：中芯国际政策是 10 月 7 日出台的成熟、先进政策的鼻祖（前身）。但拜登团队使用了所有其他已经存在或不存在的工具，以便制定一项全面的政策，不仅针对一家公司，而且针对整个国家。

对于高级先进制程半导体，我们将彻底切断。（减去我们整理的授权跨国公司的一年时间）但对于成熟工艺半导体来说，规则如此复杂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竭尽全力不去影响（一旦人们理解了规则，在几个月内，随着人们逐渐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禁止和允许的，将是一片混乱）用于生产和开发成熟节点逻辑、成熟节点存储器、老一代芯片对中国的输入。

CB：因此，即使是中国公司也被允许继续生产成熟、较旧节点的传统半导体。但 BIS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可能同时生产先进和成熟节点芯片的公司？规则是什么？

KW：这些禁令是基于设施层面，而不是公司层面。这是该规则的另一个新方面，它造成了很多混乱。并不是说规则不明确，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弄清楚真正的含义。这并不取决于一家公司是否生产先进的节点芯片。如果另一个设施（即使由同一家公司拥有）仅进行成熟节点的半导体生产，则该设施不受规则的影响。

CB：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政府本可以更进一步地说："我们不会允许任何美国设备或任何美国人为任何中国的设施提供服务，即使是制造成熟节点的设施。"你认为拜登政府为什么不这样做？

这是否是因为我们仍然面临芯片短缺的问题，即使是成熟的节点芯片也是如此？而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生产国，如果美国现在停止他们制造芯片的能力，

这可能会损害汽车行业等其他购买半导体的下游行业？我们不想让供应链中断现象变得比现在更糟？

KW：实施的规则与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演讲中阐明的国家安全意味着什么的政策愿景非常一致。因此，你的问题的答案反映了一种决心，即中国的成熟节点芯片本身并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出口管制规则不适用于它们。

我不知道政府内部对供应链的其他影响进行了哪些讨论。但从表面上看，这些规则没有应用于成熟节点芯片的原因是国家安全评估集中在先进的节点能力上。

新规则将如何影响全球半导体供应链

CB：显然，如果中国半导体公司无法从我们之前提到的 Applied Materials、Lam Research 和 KLA 等公司获得美国设备和工具，那么试图制造先进节点芯片的中国半导体公司将受到影响。这三家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日本的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和荷兰的 ASML。

所有这些公司都会受到这些新规则的影响么？

KW：我认为美国的公司会受到严重的负面财务影响。

对于两个主要的非美国竞争对手——一个在日本，一个在荷兰——我不知道这是否对他们有任何影响。事实上，在媒体报道中，他们表示这只会产生很小的影响，因为他们暗示，他们能够在没有美国设备、没有美国技术的情况下开发自己的工具，并且可以将任何参与提供支持的美国人隔离开来。

根据它是美国工具公司还是非美国工具公司，影响非常不同。

CB：在单边出口管制问题上，拜登团队从执政伊始就强调美国需要与盟国合作。10 月 7 日的政策决定是如此之大——我们几乎没有触及表面，但我们已经设法描述了美国新的出口管制如何影响总部设在韩国和台湾的公司，以及制造工具的日本 Tokyo Electron 和荷兰 ASML 公司。

10 月 27 日，在实施出口管制后，拜登政府官员、国际清算银行负责工业和安全的商务部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兹（Alan Estevez）在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上谈到了拜登政府如何与盟国合作，将这些单边出口管制转变为盟国也将实施的多边管制。

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对策

CB：在我们记录这一情况时，中国还没有正式的政策反应。所以这也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10 月 7 日的公告是否可能被视为一个转折点？“如果中国公司停止做某件事，那么他们可以再次获得这些出口和技术吗？”

KW：没有可能。问题出在中国。这是中国的生态系统。中国的国家政策是将民用和军事应用相结合，并获取具有先进能力的纯民用项目，用于军事现代化，这是一种威胁。

这条规则或政策考虑没有任何内容表明存在一个出口，因为中国政府不会改变我刚刚总结的任何政策。

本文原题名为“National Security, Semiconductors, and The US Move to Cut off China”。本文作者 Chad P. Bown 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高级研究员， Kevin Wolf 是前奥巴马政府商务部助理部长。本文于 2022 年 11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经合组织国家疫情后的劳动力短缺

Emilia Soldani、Orsetta Causa、Nhung Luu、Michael Abendschein/文 宋海锐/编译

导读：劳动力短缺会影响经济活动，加剧供应瓶颈，并且引发通货膨胀。本专栏介绍了经合组织最近的一项跨国分析，这一分析表明，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劳动力短缺呈上升趋势，并往往集中在以接触密集型、低工资和更普遍的低质量工作为特征的行业。鼓励灵活工作安排、培训和适当薪酬的公共政策干预措施有助于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编译如下：

引言

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工人群体间存在重要差异，但劳动力市场一直在强劲复苏。但是，虽然就业率有所回升，正如 Vox 之前的专栏所述，公司一直存在严重的招聘困难。根据我们最近与 Chiara Soriolo 的合作，在本专栏中，我们提出了自疫情以来发达国家劳动力短缺加剧的新证据，强调了比较视角，以期得出政策含义。

一、新的跨国证据

“职位空缺率”和“职位空缺与失业人数比率”这两个劳动力短缺的标准追踪指标表明，自疫情开始以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普遍存在劳动力短缺（图 1）。在一些国家，如美国，这种短缺是在劳动力市场已经紧张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劳动力市场在疫情之前就相对疲软。

图 1 劳动力市场一直在收紧

图 A）2019Q4-2021Q4，经合组织全体国家和选定国家的每名失业人员的职位空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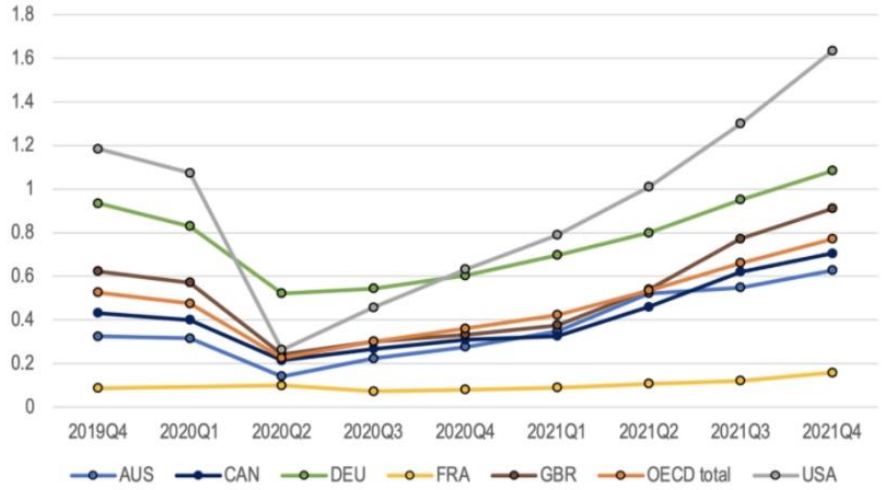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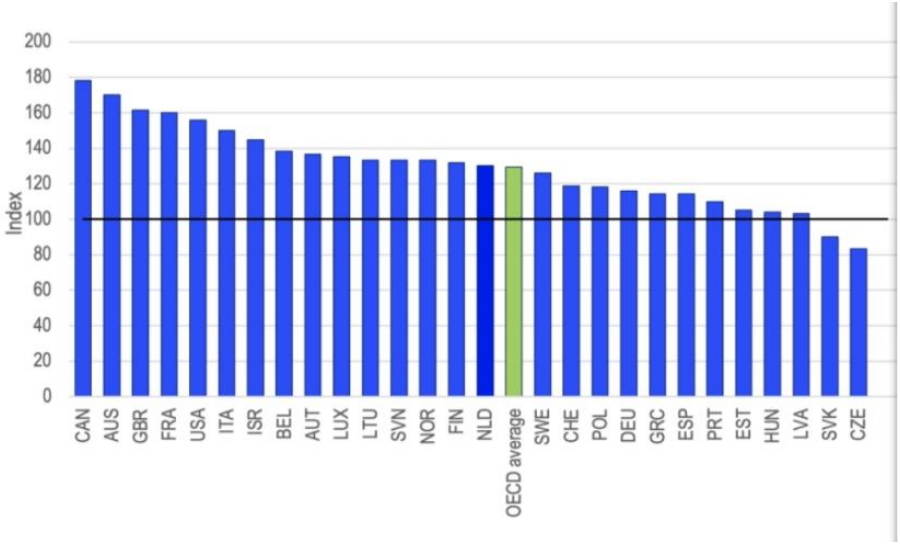


图 B）2019Q4=100 年职位空缺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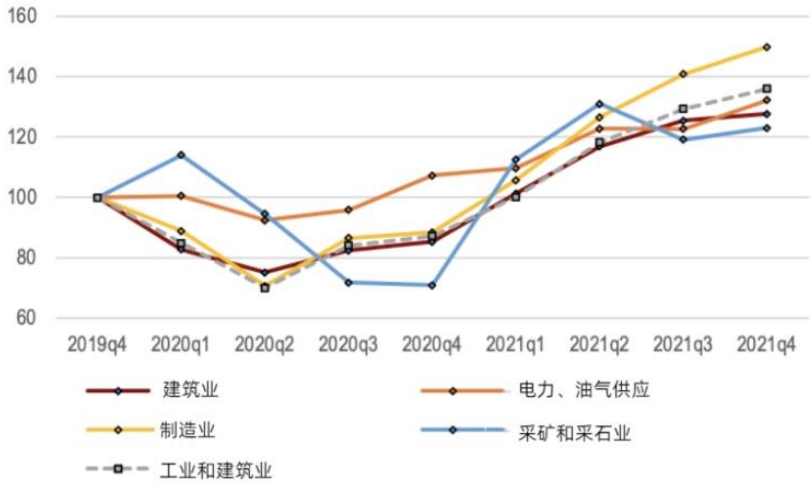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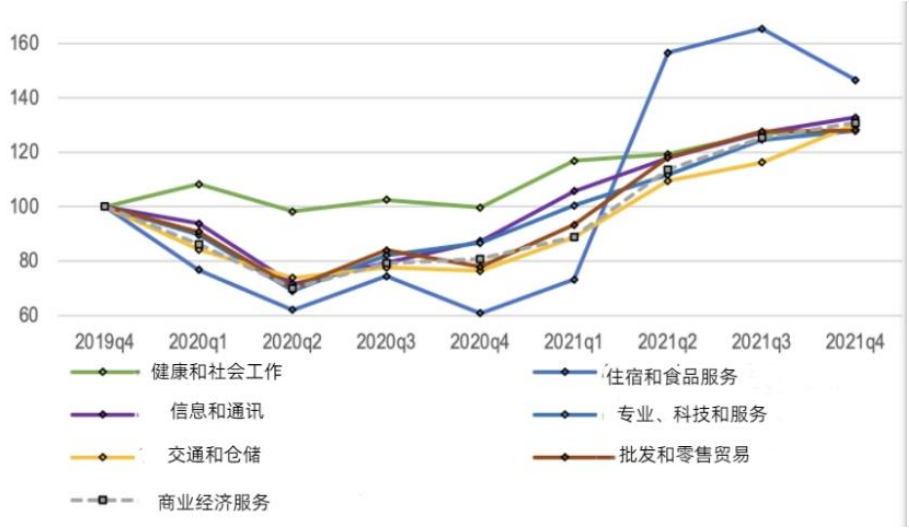
注：第一个图表显示了选定经合组织国家的职位空缺数与失业人数之间的比率。第二个图表显示了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季度职位空缺率（加拿大的数据未经过季节性调整）。

对行业层面数据的更细致的研究表明，各个行业都广泛存在劳动力的短缺，但在制造业、住宿和食品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领域尤为明显（图 2）。

图 2 各个行业都广泛存在劳动力短缺

2019 年第 4 季度各行业的职位空缺率=100，经合组织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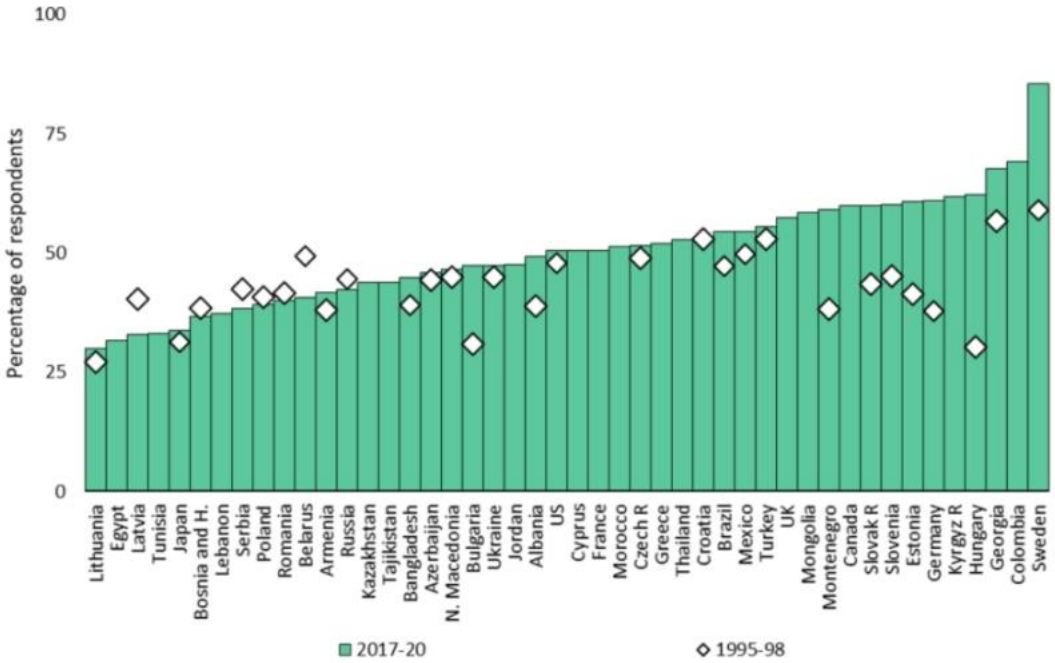


注：职位空缺率数据以季度为基础，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季节性调整

岗位空缺率的上升与辞职率的上升同时发生，尤其是在美国，但不仅如此（图 3）。

图 3 一些经合组织国家出现了“大离职”

2019Q4-2021Q3 各国离职率



注：对于欧盟国家，数据是按季度提供的，因此离职率是指在面试前三个月内报告离职的员工所占比例。在美国，季度离职率由每月离职率的总和来表示。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OECD-EU）、美国劳工统计局、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美国）

这种“大退出”或“大辞职”可能是由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共同驱动的。在周期性方面，劳动力市场收紧往往会增加工人的议价能力，从而导致更

高的工作间流动性。在结构方面，新冠肺炎危机可能引发了工人偏好的变化。工人们，尤其是那些在疫情期间处于前线的工人，可能不再接受以低工资、恶劣工作条件（轮班时间、健康风险和艰巨任务、社会福利不佳等）为特点的工作。事实上，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显示，低工资、缺乏晋升机会以及在工作中感到不受尊重是美国受访者辞职的主要原因，而跳槽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目前的工作薪酬更高、晋升机会更多、工作与生活平衡更好、灵活性更强。美国各行业的官方离职率统计数据（图 4）进一步证明了工作质量的重要性：疫情前收入较低、工作条件较差的行业（如零售业、食品和酒店业以及制造业）的离职率和空缺率普遍较高。

图 4 疫情前各行业的离职率与工资呈显著负相关

图 A）美国各行业 2021M12 年离职率和 2019M12 年时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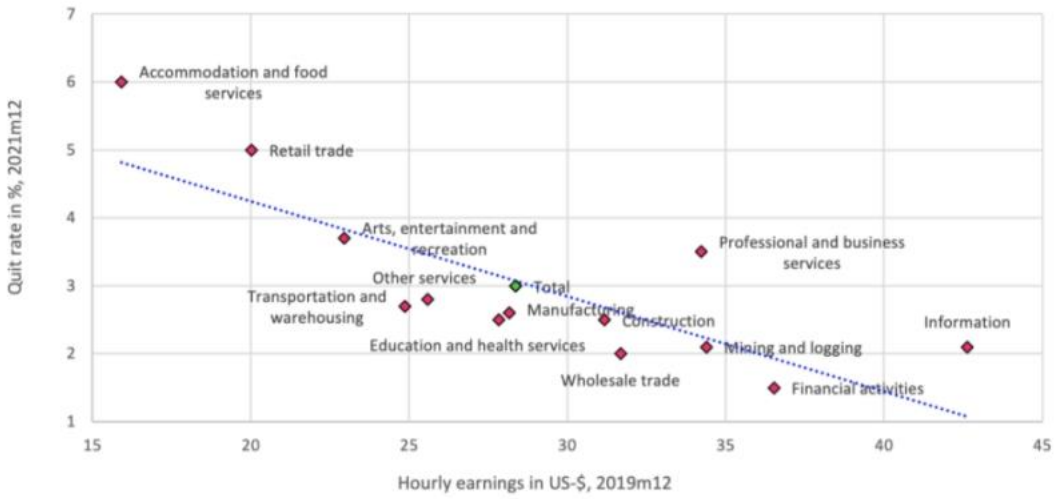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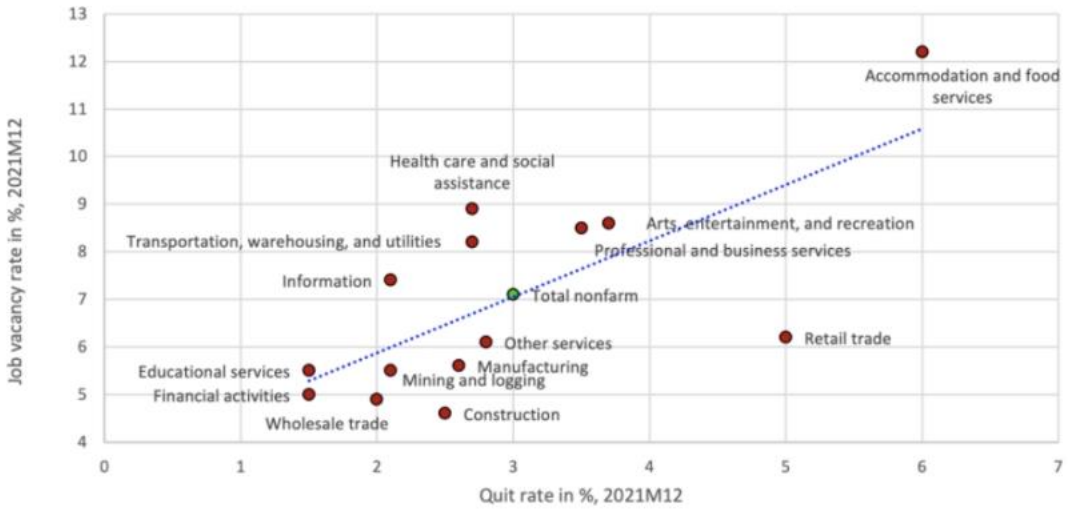


图 B）2021M12 年美国各行业的职位空缺率和离职率



注：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总工业是指总的非农业工业的退出率

二、政策影响

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政策可以做些什么？

虽然政策优先事项因国家具体情况而异，但可以考虑一些政策选项，以使劳动力短缺最严重的地方的工作对工人更有吸引力：

扩大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病假、失业救济金、临时短期工作计划）的覆盖范围，例如，将非标准工人包括在内。

鼓励公司提供灵活的工作条件，例如，在可行的情况下，在工作时间远程工作，同时提供适当的数字技能培训和基础设施。

在家庭政策、劳动法规、税收等广泛领域施加政策影响，以减少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距；特别是，要确保可以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儿童保育和具有针对性的的儿童福利。

加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鼓励求职者重新获得资格和重新分配。

在高度集中的劳动力市场中，促进工人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谈判权，以往在这些市场中，公司拥有垄断权；并应谨慎避免潜在的工资-价格螺旋效应。

促进国际移民的流入，同时确保互补的融合政策和有效承认在国外获得的资格。

本文原题名为“The Post-COVID Rise in Labour Shortages across OECD Countries”。本文作者 Emilia Soldani 是经合组织经济部结构政策分析部的经济学家，研究重点是劳动经济学、不平等、歧视和环境保护；Orsetta Causa 是经合组织经济部高级经济学家，劳动力市场和不平等工作流程负责人，研究涵盖劳动力市场动态和包容性、机会不平等和成果不平等；Nhung Luu 目前是经合组织经济部的顾问，研究主要集中在住房、代际转移和不平等；Michael Abendschein 是经合组织经济部中国/保加利亚办公室的经济学家，他曾在结构监测部门担任过职位。本文于 2022 年 11 月 28 日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就业和工资增长超出预期，美联储应对更加困难

Karen Dynan 和 Wilson Powell III/文 刘铮/编译

导读：根据 11 月的就业报告，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张，就业和工资增长超出预期。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使美联储降低价格通胀的工作更加复杂。随着美联储核心消费者价格通胀（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 PCE 价格指数）进一步上升，美联储可能需要进一步大幅提高政策利率。编译如下：

根据 11 月的就业报告，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张。上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26.3 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 20 万人（图 1）。过去三个月，平均每月新增就业人数 27.2 万人；这一速度仅为 2022 年初的一半，但仍然强劲。11 月失业率保持在 3.7%不变，接近 50 年来的最低水平，劳动力参与率为 62.1%，仍大致与今年早些时候持平。

图 1 11 月美国就业增长超过预期，但仍保持低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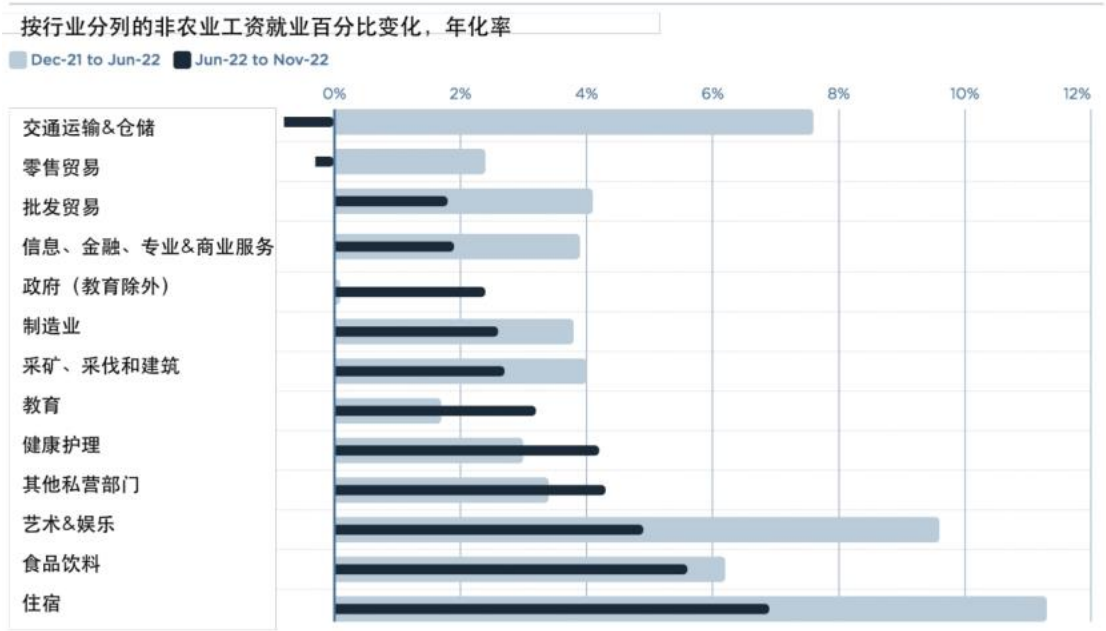
11 月就业报告中最重要的新闻涉及工资。11 月，平均每小时收入（根据各行业就业构成的变化进行调整）的 3 个月增幅大幅跃升，原因是 11 月的增幅超过预期，9 月和 10 月修正后的增幅也有所上升（图 2）。这 3 个月增幅为 6.0%，扭转了自从 2021 末工资快速增长（当时工人短缺最为严重）之后一半的下滑趋势。

图 2 工资增长低于一年前，但最近几个月明显回升

总之，11 月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使美联储降低价格通胀的工作更加复杂。正如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本周早些时候在一次演讲中所表达的那样，美联储在重新平衡劳动力市场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美联储喜欢用来度量通胀的核心消费支出（PCE）通胀（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 PCE 价格指数）的首选指标在 12 个月内上升约 5%，并在最近几个月保持稳定，美联储可能需要进一步大幅提高政策利率。

1、2022 年，大多数行业的就业增长放缓

图 3 大多数行业的就业增长都低于 2022 年上半年



自 6 月以来，大多数行业的平均就业增长都低于 2022 年上半年的平均水平，如图 3 中的黑色和蓝色线条所示。高接触的服务业、娱乐业、食品服务业、住

宿等行业的就业继续高速扩张——这些行业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后需要更长时间才能重新开放，因此就业率仍然明显低于疫情前的水平。然而，娱乐业和住宿业的就业增长大幅放缓，这表明它们的复苏正在成熟，劳动力需求正在从2021年底的水平上有所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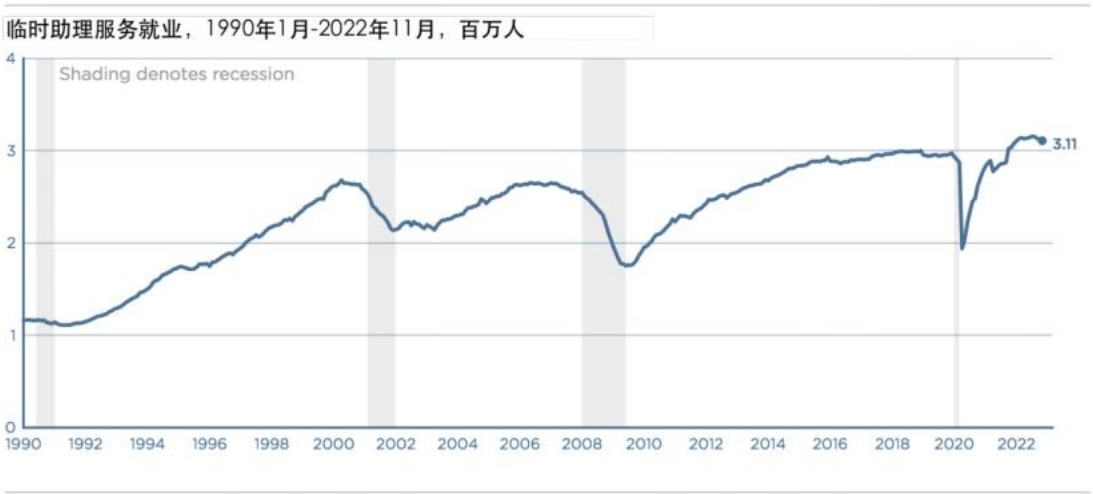
另一个工资就业增长大幅放缓的行业是运输和仓储业。在大流行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行业的就业增长很快，因为消费者为避免感染病毒，将支出集中在商品而不是服务上，购物也进一步在网上进行。这一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可能正在放缓，因为过去一年中，消费者在商品上的实际支出没有增长，电子商务的扩张可能正在减弱。然而，这一部门的工资增长仍然强劲，这表明就业增长放缓可能更多地受到工人短缺而不是需求放缓的影响。即使最近有所下降，运输和仓储部门的就业水平仍远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2、尽管美国劳动力市场有所降温，但仍相当强劲

截至 11 月的三个月，非农就业人数的平均增长为 27.2 万，比 2010 年代下半叶的平均月增长高出近 40%。而且，几乎所有主要行业的就业增长都继续保持为正（图 3）。即使在对利率敏感的建筑业，非农就业也保持正增长，自今年早些时候美联储开始加息以来，该行业的活动已经减弱。

临时助理服务业（Temporary Help Services）的就业率一直是最近经济衰退的风向标——一般在商业周期达峰前的几个月，这一类别的就业率开始下降（图 4）。该就业率在 2022 年上半年高位运行后，最近几个月略有下滑。这一变化与劳动力市场的降温相一致，但迄今为止累计降幅很小。此外，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临时助理服务业的就业率出现了小幅下滑，但随后并未出现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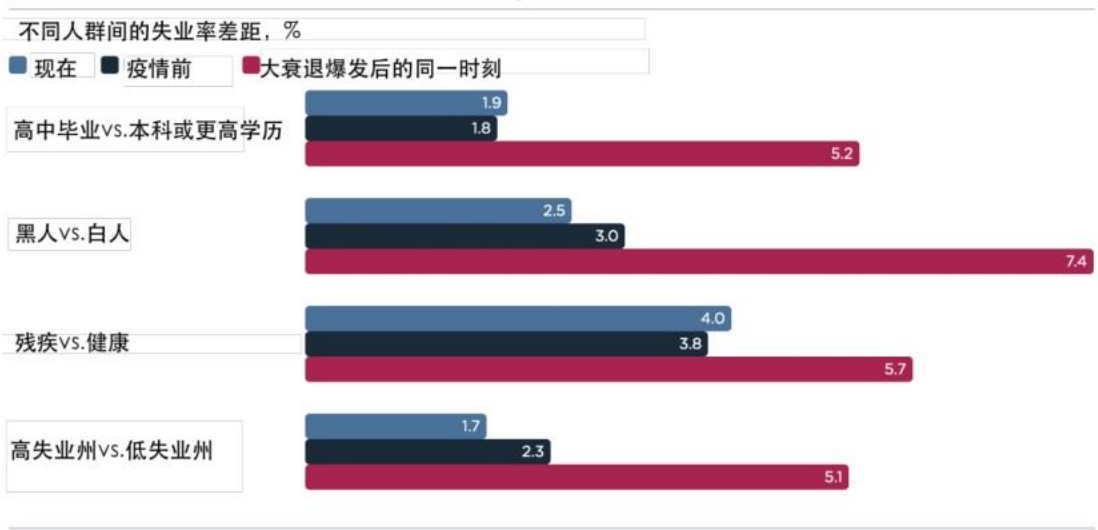
图 4 与劳动力市场降温一致，临时助理服务的就业率从非常高的水平下滑



3、劳动力市场紧张对工人有利

劳动力市场紧张的一个好处是，它们往往会缩小传统上优势和弱势工人之间的就业差距。这种差距在疫情前强劲的劳动力市场中缩小，现在相对较小（图 5）。仅持有高中文凭工人的失业率仅比拥有本科或更高学历的工人高 1.9 个百分点，与大流行前的差距相当，仅为2007-2009年“大衰退”爆发后同一时期差距的三分之一左右。黑人和白人工人的失业率差异也存在类似的模式，残疾和非残疾工人的失业差距也已降至相对较低的水平。

图 5 由于劳动力市场状况依然强劲，优势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失业差距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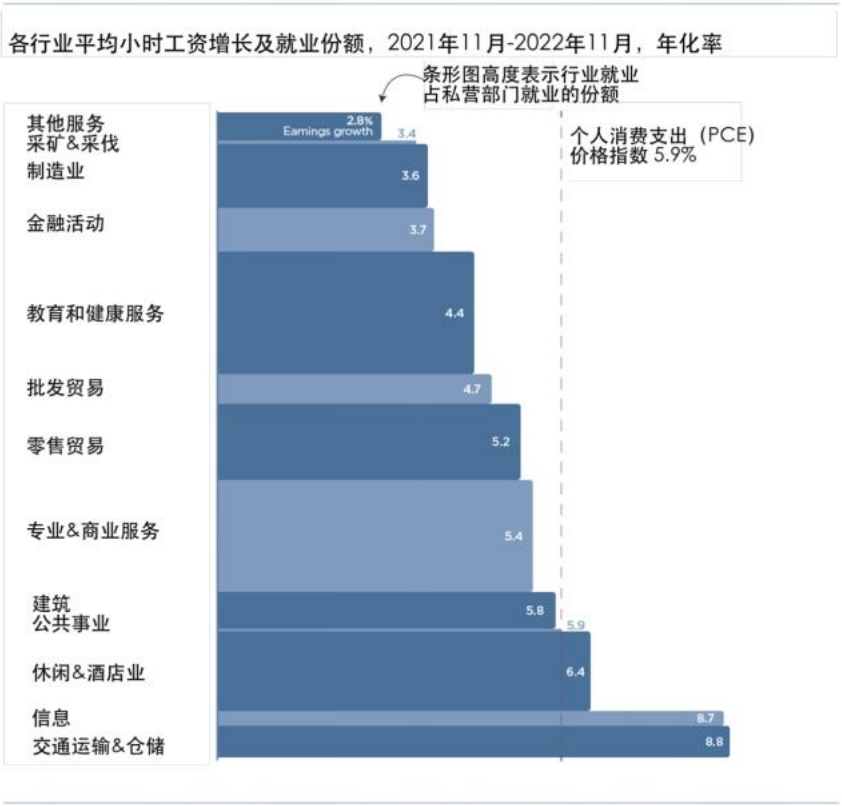


同样，美国劳动力市场在全国都很强劲。图 5 中的最后一组条形图显示了州失业率的第 90 百分位和第 10 百分位之间的差距。目前，这一差距仅为 1.7 个百分点，处于历史范围的低点。这与 2010 年代末和 2020 年初劳动力市场强劲时期的情况相似，远低于大衰退爆发后近 3 年的水平。

4、虽然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在上涨，但仍赶不上通货膨胀

与 2010 年代末的一个关键区别是，由于高通胀，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都在下降。休闲和酒店业、信息业、运输和仓储业的工资增长最快，过去 12 个月的工资增长率在 6.5%至 9%之间（图 6）。这些行业（约占就业人数的 20%）的工资增长高于近 12 个月的消费价格变化。在其他行业，工资增长低于消费价格增长（建筑业和公用事业除外，这些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长大致与通货膨胀保持一致）。

图 6 多数行业工人正在经历实际工资下降



5、美联储应对通胀的斗争仍需继续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仍远高于美联储 2%的目标，这削弱了大多数工人收入的购买力，给一些人带来了真正的困难。11 月的就业报告显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正逐步走向更好的平衡。然而，目前的工资增长速度仍远高于美联储的目标，衡量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的关键指标（如职位空缺率和离职率）仍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在劳动力市场上制造更多的疲软需要进一步抑制总需求，这意味着美联储需要继续收紧财政政策，直到它有信心创造出必要的劳动力市场疲软。因此，失业率可能会大幅上升，失业可能会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弱势工人身上。这些巨大的成本凸显了强大的美国安全网的重要性。但是，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降低通胀，将使通胀陷入高位或进一步上升的风险继续增加，到那时再抑制通胀将需要更大幅度削减经济活动，代价也更加高昂。

本文原题名为“US Job and Wage Growth Beat Expectations, Making the Fed's Job Harder”。Karen Dynan（PIIE）自 2017 年 3 月起担任 PIIE 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实践教授。Wilson Powell III（哈佛肯尼迪学院）于 2017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担任 PIIE 的研究分析师，曾在经济顾问委员会担任研究经济学家，在达特茅斯卫生政策和临床实践研究所担任卫生政策研究员。本文于 2022 年 12 月发布于 PIIE 官网本文作者。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卢拉能否解决巴西的问题

Jon Danielsson /文 孔祥奕/编译

导读：巴西总统选举在经历了近一个月的两轮投票后落下帷幕。劳工党领袖卢拉第三度当选，创造了拉美政坛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一次回归。现年 77 岁高龄的卢拉是巴西政坛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曾在2003-2011年间连任两届巴西总统，带领巴西实现了经济腾飞，却也是巴西军政府时期结束后唯一一位被捕入狱的总统。卢拉的就任仪式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举行。然而，胜选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卢拉上任后仍将面临多重挑战。编译如下：

巴西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在大选中获胜。他曾于 2003 年—2011 年期间担任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两极分化的背景下击败了极右翼现任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

卢拉即将开始的第三届任期对巴西民主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面临严峻的考验。重新推行民生计划和保护热带雨林等自由主义改革主张存在一定阻碍。

如今巴西的政治环境与卢拉 2003 年上任时不同。虽然当时巴西经济举步维艰，但商品价格上涨和全球资本流动为卢拉竞选承诺的社会计划和宏观经济稳定铺平了道路。

卢拉当年的政策帮助数百万巴西人摆脱了贫困，在他执政的前四年里也给巴西带来了财政盈余、经济增长以及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即使在第一届任期结束时爆出了腐败丑闻，他还轻松连任。他的第二届任期也很成功，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帮助巴西避免了 2008 年—2010 年全球金融危机。卢拉于 2010 年底卸任，是巴西近年来最受欢迎的总统。几年后，卢拉因第二次腐败丑闻入狱两年。2021 年，卢拉的有罪判决被取消，得以参与今年的竞选。

上世纪 80 年代末重新民主化以来，巴西总统需要与国会的敌对派系结成联盟才能执政，这恰好发挥了卢拉作为谈判家和政治家的优势。他现在更需要这些来帮助他在这届任期获得成功。

巴西的政治体制高度分散，反民主政党的崛起让卢拉比以前更难控制巴西。卢拉的工人党组成了一个由十个政党组成的联盟——民主阵线（Democratic Front）。联盟的建立使民主阵营与博尔索纳罗的反民主阵营针锋相对。他的新政府需要内部谈判以维持阵线内的稳定。同时，他也面临博尔索纳罗赢得国会席位的盟友的反对。卢拉的立法和经济改革等主张将会面对复杂的内外部政治谈判。

卢拉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就职，接过这个存在经济财政问题的国家。博尔索纳罗执政期间，废止了环境保护法规及相关机构，漠视社会保障，巴西贫困加剧，百姓和儿童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近 700,000 人死于新冠疫情。更值得关

注的是，博尔索纳罗执政期间亚马逊地区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巴西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举措背道而驰。

虽然巴西一些经济指标表现良好，但整体经济前景较为黯淡。通货膨胀率同比增长为 6.5%，较为温和。2022 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2.5%左右。这些指标具有一定的欺骗性。通货膨胀率因为强制降低燃油税而下降，经济增长率因博尔索纳罗不可持续的预算支出扩张而被夸大。巴西并未在 2023 年给消除饥饿和儿童营养不良等社会需求足够的预算。

因此，卢拉在第三届任期将与国会谈判调整预算支出上限，同时提议改革巴西财政框架。修改宪法也将给卢拉带来额外的挑战。

卢拉已宣布不参加 2026 年的连任竞选。应该被理解为建立他的遗产，挽救他作为负责巴西重大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性的务实领导人的记录。

他最后这届任期的重点是继续之前推行的改革，维持自己务实的领导人形象，给巴西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卢拉虽然无法改变外部环境，但可以让巴西走出博尔索纳罗时代，恢复正常。未来四年，卢拉的政治能力将接受考验。

本文原题名为“Lula is Back, but Can He Fix Brazil’s New Problems？”。本文作者 Monica de Bolle，系 PIIE 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22 年 11 月刊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IIE。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什么类型的资本流动有助于改善国际风险分担？

Ergys Islamaj 和 M. Ayhan Kose /文 张丝雨 / 编译

导读：跨境资本流动有望通过促进全球金融市场的借贷，改善国际风险分担。本文研究了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各种类型的资本流动（外国直接投资、投资组合股权、债务、汇款和援助流动）的风险分担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汇款和援助流动与日益增加的国际风险分担有关。其他类型的资本流动与更好的风险分担结果并不一定相关。这些发现对不同的计量模型设定、国家特异性特征与其他控制变量是稳健的。编译如下：

1. 引言

将消费的波动独立于产出的波动之外是决定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拥有外国资产和在经济下滑时获得短期外国借款这一简单安排，有助于将国内消费的波动与产出的波动脱钩（Obstfeld 1994；Lewis 1996）。只要各国的产出波动不完全同步，而且金融市场有效运作，与产出不确定性相关的风险就可以通过资本流动在各国间分散。这反过来又有助于降低消费运动对国内产出波动的依赖性，改善国际风险分担。

大量的实证文献发现，跨境资本流动，如外国直接投资和债务流动对国际风险分担的影响很小。。某些类型的资本流动与发达经济体风险分担的改善相关，但大多数类型的资本流动与国际风险分担的程度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强有力的关系。某些类型的资本流动与发达经济体风险分担的改善有关，但大多数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风险分担程度似乎并无密切关系。尽管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在这方面已经被广泛研究，但目前还没有对汇款和外国援助流动的影响的全面研究。汇款和外国援助流动对国际风险分担的影响还没有全面的研究。汇款和援助流动被视为跨境资本流动的替代品，因为它们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外部资金的重要来源（图 1）。

我们研究了汇款和援助流动，它们可能是特定国家消费对产出变化敏感性在时间变化上的驱动因素。这种敏感性是实证文献中对国际风险分担的标准衡量。本研究还全面比较了各种类型的资本流动对国际风险分担结果的影响。我们发现，汇款和援助流动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际风险分担有促进作用。其他类型的资本流动，如 FDI、股权和债务流动，似乎对风险分担没有持续的重大影响。这些发现对不同的计量模型设定、国家特异性特征与其他控制变量是稳健的。

汇款将国家具体消费增长的波动与国家具体产出增长的波动脱钩的能力，与汇款动机相关联。这些动机可能会影响商业周期中的资金流动量及其变化。最基本的区别是利他主义动机和由自我利益驱动的动机。如果汇款由利他主义

动机驱动，它们往往是反周期的，有助于降低消费对收入变化的敏感性。另一方面，如果汇款由自我利益驱动，并且主要用于投资目的，它们往往是顺周期的，并导致消费和产出增长之间更强的关联性（Acosta， Lartey and Mandelman 2009）。证据表明，汇款对于接受国的商业周期来说是非周期性的。与其他类型的资本流动不同，汇款是不求回报的转移，无需偿还，其目标是那些更有可能受到流动性限制的消费者。它们是家庭内部的私人流动，可能由利他主义驱动，很难有选择性地征用。因此，它们有可能将消费的波动与产出的波动区分开来，从而改善国际风险分担的标准措施。

外国援助流动也可能改善风险分担的结果。与其他类型的私人流动不同，援助流动是国家之间的自愿转移。如果它们采取礼物和赠款的形式（或者它们可以是低息贷款），则不需要偿还。它们往往针对社会中最贫穷的、没有保险安排来平抑收入波动的群体。由于援助资金可以帮助抑制对消费的不利冲击，它们可以降低消费的波动性并进而改善风险（Canova and Ravn 1996；Pallage，Robe and Beroube 2006）。

汇款和援助流似乎都是相对稳定的外国融资形式（图 2）。私人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和顺周期性已被广泛记录（Reinhart and Reinhart 2009）。然而，汇款和援助流动并不急剧，它们也不与其他类型的资本流动相协调。事实上，在金融危机期间，汇款往往具有弹性，当其他类型的资本流动显著下降时，汇款的上升趋势往往会继续（De et al. 2019）。当受援国遭受不利冲击时，援助流量往往会增加（Dabla-Norris、Minoiu and Zanna 2015）。汇款可以通过储蓄和改善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使跨期消费趋于稳定（Adams and Cuecuecha 2013；Acosta，Lartey and Mandelman 2009；Mandelman and Zlate 2012）。通过对金融部门发展的积极影响，汇款和援助都可以减少消费波动（Aggarwal、Demirguc-Kunt and Martinez Peria， 2011；Maruta 2019）。汇款和援助流动的这些特点表明，汇款和援助可以在面临经济困境时为经济活动提供支持，并有助于促进更好的风险分担结果。

本论文与其他专注于不同类型资本流动行为的分支文献有关。例如，它与Lucas（1990）关于资本分配之谜的研究有关，该研究探究了为什么如此少的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许多研究对这一难题作出了解释：制度不发达和征收风险导致资本流向上坡（Alfaro， Kalemli-Ozcan and Volosovych 2008；Bai and Zhang 2010；Benhima 2013）；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问题迹象反应过度（Chinn，Dooley and Shrestha 1999；Chinn and Kletzer 2001）。近期研究涉及汇款和援助流动与非法资本外流之间的联系。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发展援助等流动与非法外流呈正相关，而汇款则与非法外逃资本呈负相关（Steinkamp and Westermann

2021）。援助可能容易被受援国政府挪用，但通过汇款支持其家人的外国工人不会容忍此类行为。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下一节简要介绍了数据库和实证框架；第三节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和国际风险分担之间的联系，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测试；第四节提供了一些结论性意见。

2. 数据库和实证框架

2.1 数据库

本文使用包括大量新兴市场经济体样本的数据库来研究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风险分担之间的关系。实际消费和实际 GDP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人口统计数据来自联合国的国民账户主要总量数据库。众所周知，总产出和消费数据是非平稳的，而这些变量的第一次差值是平稳的。因此，我们遵循标准做法，使用第一差分序列来进行分析。

汇款总额包括个人转移（其定义为居民家庭从非居民家庭收到的所有现金或实物的经常性转移）以及雇员报酬（其定义为居住在国外的工人的总收入）。汇款流入量来自 IMF 基于《国际收支手册 6》（BPM6）的国际收支统计。外国援助数据来自 WDI，指的是净官方发展援助和官方援助（ODA）。官方援助净额的定义不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发展粮食援助和债务减免赠款。资金流动数据（金融一体化的实际措施）来自 IMF 的国际收支账户和 Lane 和 Milesi-Ferretti（2007）的数据集。该数据库还包括金融一体化和贸易开放度的去伪存真措施。对于去伪存真的金融一体化，我们使用 Chinn 和 Ito（2006）的措施，它提供了最全面的国家和时期覆盖。贸易开放度被定义为出口加进口对 GDP 的比例，系列数据来自 WDI。根据早期的工作，我们剔除了人口少于一百万的国家。我们还剔除了汇款流入量观察值少于 10 的国家。最后，对于我们的基线结果，我们使用 1990-2018 年期间 79 个 EMDEs 的样本。

2.2 实证方法论

我们遵循标准文献，这些文献检验了消费欧拉方程的各种含义，以估计汇总数据中国际风险分担的程度（Obstfeld 1994；Lewis 1996；Kose， Prasad and Terrones 2009）。这些研究采用了一个简单的框架，该框架基于标准完全市场模型的预测，并对国别消费增长对国别产出增长的影响进行回归：

$$\Delta c_{t+1}^{j} - \Delta c_{t+1} = \alpha + \beta(\Delta y_{t+1}^{j} - \Delta y_{t+1}) + \epsilon_{t+1}^{j} \qquad (1)$$

此处 Δc_{t+1}^{j} (Δy_{t+1}^{j}) 表示国家j消费（产出）在t+1 时的人均增长； Δc_{t+1} (Δy_{t+1}) 代表着世界消费（产出）在t+1时的增长；ϵ_{t+1}^{j}相对静止，代表测量误差；β衡量

风险分担程度。从理论上讲，在一个具有完整的国际金融市场和完美的风险分担模型中，系数β反映了各国未投保的特异性消费风险程度，数值上为零。在实践中，早期的研究对β进行了务实的解释，认为该系数可以用来衡量风险分担的程度。国家特定的消费和产出增长之间的特异性压缩程度越小，β就越小，国际风险分担的程度就越大（Asdrubali， Sørensen and Yosha 1996）。Δct+1 和Δyt+1 是分别衡量消费和产出的总（共同）波动的指标。由于各国无法消除与总波动有关的风险，因此要从相应的特定国家变量中减去每个变量的共同组成部分。

为了更直接地估计金融一体化和资本流入对国际风险分担的量化影响，我们采用了文献中的标准方法，并考虑每种类型的流动对特定国家消费增长和特定国家产出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Lewis 1996； Kose， Prasad and Terrones 2009）。除此之外，我们还对国家的消费增长与国家的产出增长进行了回归。

$$\Delta c_{t+1}^{j} - \Delta c_{t+1} = \alpha + \gamma I_{jt+1} + \beta\left(\Delta y_{t+1}^{j} - \Delta y_{t+1}\right) + \delta I_{jt+1}\left(\Delta y_{t+1}^{j} - \Delta y_{t+1}\right) + \epsilon_{t+1}^{j} \quad (2)$$

其中，Ijt+1 代表着 t 时间的跨境金融流动（占 GDP 百分比）。系数β估计了特定国家的消费增长对特定国家的产出增长的敏感性，如等式（1）所示。我们在回归中增加了一个交互项，以衡量跨境流动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消除特定国家的消费增长与特定国家的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负Ijt表明，利息变量（Ijt+1）有助于降低特定国家消费增长对特定国家产出波动的敏感性，从而提高国际风险分担。

3. 汇款和国际风险分担

3.1 基线结果

我们采用动态面板框架对方程（2）进行估计，该框架采用 Ostergaard，Sørensen 和 Yosha（2002）的面板数据广义最小平方（GLS）估计。这种方法允许在存在AR（1）面板内自相关、面板间横截面相关和异方差的情况下进行估计。表 1 显示了汇款和援助流入对不同国家组的风险分担的影响。我们在回归中涉及了所有国家和 EMDEs。结果显示，汇款与 GDP 的交互系数和援助流入与 GDP 的交互系数均为负，并且在统计学上与零显著不同。我们还限制了金融一体化的不合法措施，然而汇款与 GDP 的交互作用系数和援助流入与 GDP 的交互作用系数仍然为负，且在统计上与零有显著区别，这表明汇款和援助流入对国际风险分担有积极影响。

在基线回归中，国别消费增长对国别产出增长的回归的估计系数为 0.8。汇款和援助流入对风险分担的影响由系数δ来体现，该系数为负，在统计上与零有明显差异。按照方程（2），对于一个接受汇款或援助流入（相对于 GDP）的 EMDE 来说，其风险分担程度相当于过去 15 年的样本平均值（分别为 5.2%和

4.2%）可以计算为（1-β-δ*$meanREM/AID$）。其中最后一项（δ*REM/AID）表示通过汇款或援助实现的风险分担部分（REM/AID指汇款或援助对于 GDP 的平均值）。δ的估计表明，平均而言，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实现的风险分担中，约 19%可归功于汇款，约 10%归功于外国援助。

接下来，我们分析了其他类型的资本流动如何影响我们关于汇款和援助流动的研究结果。在表 2A 中，我们在控制其他类型的金融流动的情况下，考察了风险分担和汇款流入 GDP 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汇款对 GDP 的相互作用系数与特定国家的产出增长总是负的，在统计上有显著差异。这表明，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汇款额与特定国家的消费增长和特定国家的产出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较低，或与更好的国际风险分担有关。在不同的规格中，估计的系数δ似乎是稳定的（负 0.01 左右）。援助流动也有助于改善风险分担结果（第 1 列）。相比之下，其他变量的系数（对应于产出增长与其他类型跨境流动的相互作用）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其他类型的资本流动与风险分担之间不存在强有力的关系（第 2-8 列）。

表 2B 显示了风险分担和援助流入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其他类型的资金流动数值进行一定的控制。结果表明，与汇款的情况一样，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援助流量与特定国家的产出增长的相互作用系数总是负的，并且在统计上显著不同于 EMDE 经济体样本的零。这表明对外援助与更好的国际风险分担有关。在不同的规格中，估计的系数δ似乎是稳定的（负 0.005 左右）。其他类型的资本流动对风险分担没有显著影响。

表 3 比较了汇款和援助流动与其他类型资金流动的风险分担潜力。兴趣系数δi在第三列，对应于特定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与每个变量的相互作用。第二和第三栏显示了汇款和援助流入对新兴市场国家风险分担影响的基线结果。其他栏则体现了其他类型资金跨境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其他资本流动与更好的风险分担结果之间并没有强相关性。

较高的负债存量似乎与更好的风险分担结果并不相关。总负债、外国直接投资和投资组合权益负债（第 4-7 栏）的系数δi在统计上与零无差异。负债存量占 GDP 的比例并不能解释这类流动缺乏风险分担的现象。在外国直接投资、投资组合股本和债务流动的情况下，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第 8-10 栏）。法律上的金融开放和贸易一体化与改善风险分担无关（第 11-12 栏）。

3.2 稳健性

为了检查本实验稳健性，我们进行了一系列额外验证。我们控制不同类型的金融流动，并检查所得结果在不同时期、设定替换和不同国家样本下的稳健性。

额外控制：在表 4A 中，我们调查了汇款流入对风险分担的影响，同时控制了不合法的金融一体化和其他类型的资金流动，主要发现仍成立。首先，汇款与更好的国际风险分担结果密切相关。其次，研究结果也支持其他类型的跨境资金流动、不合法的金融一体化或贸易流动与更有效风险分担结果相关的假设。这些结果与文献中未能在 EMDEs 中发现资金流动对风险分担的稳健影响的结果一致（Kose， Prasad and Terrones 2009；Bai and Zhang 2012）。表 4B 调查了援助流动和风险分担之间的关联，同时控制了不合法的金融一体化和其他类型的金融流动。在不同的规范中，对外援助与风险分担的增加是相关的。接下来，我们在控制汇款和援助流动、不合法的金融一体化和其他类型的金融流的同时，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表 5 显示，我们的主要结果适用于所有设定：汇款和援助流量与风险分担的改善相关。

替换方法、时间段和样本：公式（2）的估计可能会带来各种计量经济学上的挑战，特别是在短样本中。例如，如果产出是非平稳的，而产出增长表现出正的序列相关性（如汇总数据现实），则误差项将预测未来的产出，并与同期的产出增长相关。这意味着消费增长可能与误差项相关。因此，普通最小二乘（OLS）估计将产生偏差的结果，因为它不会控制内生性。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有效的收入增长工具，β和δ将无法识别。为了克服其中的一些挑战，我们使用了一个动态面板框架，该框架使用了广义最小二乘（GLS）估计来控制面板内部和跨面板的自相关性，以及异方差。与此同时，这些类型的挑战在足够长的时间序列中不太可能成为问题。只要我们的样本涉及的时间段足够长，就可以产生不受固定面板回归框架（面板 OLS）中样本量相关警告影响的结果。

我们还检查了 1980-2018 年和 2000-2018 年较长时间框架内结果的稳健性，以及接收大量汇款和援助流量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子样本。结果与基线调查结果相似，表明汇款和援助流量与更好的风险分担结果密切相关。

4. 结论

我们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风险共担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与其他研究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使用一个涵盖了 30 多年来大量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库来研究这种关系。根据理论预测，跨境金融流动应该会增加有效分担风险的机会，从而降低特定国家的消费增长和特定国家的产出增长之间的运动。

本文所涉及的实证方法很简单，因为本文只研究了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在推动特定国家消费对特定国家产出变化敏感性的时间变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标准理论模型的预测相反，跨境流动（金融一体化的实际衡量标准）和法律上的金融一体化衡量标准似乎与新兴市场国家更好的国际风险分担结果无关。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汇款和援助流动往往与更好的风险分担结果密切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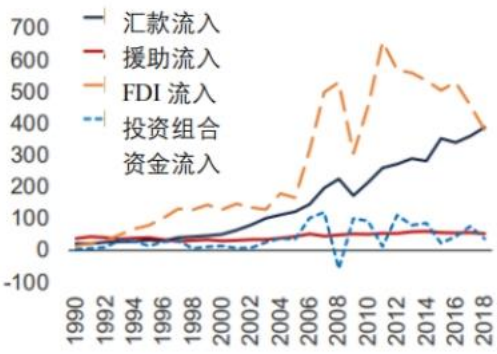
汇款和援助流动具有某些特点，自然是改善跨境风险分担安排的更好选择。本文的发现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两个方向。首先，利用动态的多国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不同类型资本流动（包括汇款和援助流动）的风险分担后果将是有益的。其次，未来的研究还可以通过分析汇款和援助流动与国别特征以及其他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重点研究这些流动改善风险分担结果的潜在渠道。

附录

图 1 汇款、援助和资本流入 EMD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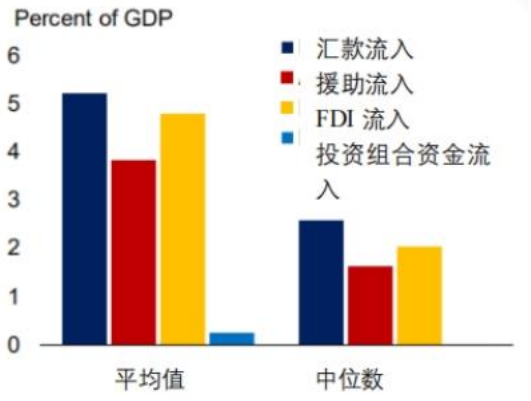
a.总流入

当前数十亿美元



b.资金流入占 GDP 的份额，2003-2018

占 GDP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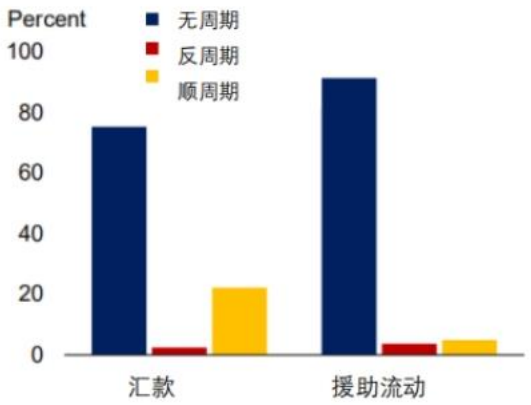
来源：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注：a.共有 79 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b.平均值是指 2003-2018 年期间的未加权平均值。

图 2 资本流入 EMDEs 的周期性特性

a.流入的波动性

b.汇款和援助流入的周期性变化



来源：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注：a.条形图表示 EMDE 国家每种资本流动的波动中位数。波动率被定义为相关流量与 GDP 的去趋势比的标准差。b.包含无周期、反周期和顺周期汇款或援助流动的国家的百分比。周期性被定义为实际 GDP 与汇款或援助之间的相关关系。周期性被定义为去趋势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汇款或援助流量之间的相关性。使用 Hodrick Prescott（HP）滤波器将每个系列分解为趋势和周期成分，样本周期为 1990-2018 年。如果汇款与产出的周期成分之间的相关性为正且在统计上不同于零，则汇款被认为是顺周期的；如果汇款与产出的周期成分之间的相关性为负、且在统计上不同于零，则汇款被认为是非周期的。

表 1 汇款、外国援助流入和国际风险分担

	EMDE	All countries	EMDE	All countries	EMDE	All countries	EMDE	All countries
	(1)	(2)	(3)	(4)	(5)	(6)	(7)	(8)
产出增长	0.799	0.758	0.810	0.808	0.829	0.829	0.849	0.858
	0.021***	0.016***	0.018***	0.017***	0.031***	0.029***	0.030***	0.029***
汇款流入	-0.174	0.011			-0.174	-0.035		
	0.116	0.103			0.120	0.107		
汇款×产出增长	-0.009	-0.006			-0.009	-0.007		
	0.004**	0.004*			0.004**	0.004**		
援助流入			-0.421	-0.414			-0.414	-0.405
			0.135***	0.134***			0.135***	0.134***
援助流入×产出增长			-0.005	-0.005			-0.005	-0.005
			0.001***	0.001***			0.001***	0.001***
De-jure					-0.001	-0.004	-0.001	-0.001
					0.002	0.001***	0.002	0.002
De-jure×产出增长					-0.076	-0.124	-0.090	-0.105
					0.058	0.039***	0.056	0.050**
常量	0.004	0.003	0.005	0.005	0.004	0.005	0.006	0.006
	0.003	0.002	0.003*	0.003*	0.003	0.002***	0.003**	0.003*
观测值	1,799	2,606	1,725	1,810	1,799	2,606	1,725	1,810
IFS 码	79	110	79	88	79	110	79	88

来源：世界发展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平衡表

注：稳健标准误差报告在括号中。考虑时间固定效应的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因变量为人均消费的特殊增长 $(\Delta c_{t+1}^{j} - \Delta c_{t+1})$。估值基于公式（2）得出。产出增长是指人均 GDP 的特殊增长 $(\Delta y_{t+1}^{j} - \Delta y_{t+1})$。所有国家（All countries）包括发达经济体（EMDE）。样本期为 1990-2018 年或根据可获得的数据而定。*、**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的统计学意义。汇款和援助流动变量的系数和标准误差乘以 10^3。

表 2A 汇款、跨境流动和国际风险分担

	援助流入	总负债	FDI 负债	投资组合股权负债	债务负债	FDI 流入	投资组合股权流入	债务流入	贸易开放
	(1)	(2)	(3)	(4)	(5)	(6)	(7)	(8)	(9)
产出增长	0.836	0.800	0.801	0.791	0.804	0.803	0.800	0.802	0.810
	0.021***	0.025***	0.024***	0.024***	0.025***	0.021***	0.021***	0.022***	0.040***
汇款流入	-0.162	-0.184	-0.172	-0.202	-0.185	-0.172	-0.172	-0.173	-0.210
	0.116	0.117	0.116	0.120*	0.116	0.116	0.116	0.116	0.120*
汇款×产出增长	-0.009	-0.009	-0.010	-0.009	-0.009	-0.010	-0.009	-0.010	-0.009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合作	-0.357	-0.003	-0.007	-0.056	-0.006	0.004	0.038	-0.003	0.025
	0.137***	0.003	0.012	0.048	0.005	0.026	0.100	0.012	0.019
合作×产出增长	-0.005	0.000	0.000	0.002	0.000	0.000	-0.002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2	0.000	0.001	0.003	0.000	0.001
常量	0.005	0.004	0.003	0.004	0.004	0.003	0.004	0.004	0.002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观测值	1,725	1,799	1,799	1,799	1,799	1,799	1,799	1,799	1,799
国家数量	79	79	79	79	79	79	79	79	79

来源：世界发展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平衡表

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国家组。包含时间固定效应的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方括号报告了稳健性的标准错误。其因变量是人均消费的特殊增长 $(\Delta c_{t+1}^{j} - \Delta c_{t+1})$。

估值基于公式（2）得出。产出增长是指人均 GDP 的特殊增长 $(\Delta y_{t+1}^{j} - \Delta y_{t+1})$。合作指的是各自列中的变量占 GDP 的百分比。1990-2018 年或根据可获得的数据而定。*、**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的统计学意义。汇款流入和合作变量的系数和标准差乘以 10^3。

表 2B 国外援助、跨境资金流动和国际风险分担

	汇款流入	总负债	FDI 负债	投资组合股权负债	债务负债	FDI 流入	投资组合股权流入	债务流入	贸易开放
	(1)	(2)	(3)	(4)	(5)	(6)	(7)	(8)	(9)
产出增长	0.836	0.804	0.811	0.809	0.806	0.810	0.812	0.811	0.833
援助流入	0.021***	0.024***	0.021***	0.020***	0.022***	0.018***	0.018***	0.018***	0.038***
援助流入×产出增长	-0.35735	-0.38918	-0.41041	-0.4359	-0.37697	-0.42148	-0.42054	-0.42309	-0.42264
合作	0.137***	0.137***	0.135***	0.136***	0.139***	0.135***	0.135***	0.136***	0.136***
合作×产出增长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6**	**-0.005**
常量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162	-0.005	-0.005	-0.034	-0.009	-0.006	0.052	-0.029	0.027
	0.116	0.005	0.013	0.042	0.006	0.021	0.107	0.016*	0.018
	-0.009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3	0.001	0.000
	0.004**	0.000	0.001	0.002	0.000	0.001	0.003	0.000	0.001
	0.005	0.005	0.005	0.005	0.006	0.005	0.005	0.006	0.004
观测值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国家数量	1,725	1,725	1,725	1,725	1,725	1,725	1,725	1,725	1,725
	79	79	79	79	79	79	79	79	79

来源：世界发展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平衡表，Lane and Milesi-Ferretti（2007）

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国家组。包含时间固定效应的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方括号报告了稳健性的标准错误。其因变量是人均消费的特殊增长 $(\Delta c_{t+1}^{j} - \Delta c_{t+1})$。

估值基于公式（2）得出。产出增长是指人均 GDP 的特殊增长 $(\Delta y_{t+1}^{j} - \Delta y_{t+1})$。合作指的是各自列中的变量占 GDP 的百分比。1990-2018 年或根据可获得的数据而定。*、**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的统计学意义。援助流入（Aid inflows）和合作变量的系数和标准差乘以 10^3。

表 3 国际风险分担的决定因素

	基线	汇款流入	援助流入	总负债	FDI 负债	投资组合股权负债	债务负债	FDI 流入	投资组合股权流入	债务流入	法定人口	贸易开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产出增长	0.771	0.799	0.810	0.770	0.772	0.762	0.774	0.774	0.772	0.773	0.807	0.783
合作	0.017***	0.021***	0.018***	0.021***	0.020***	0.019***	0.021***	0.017***	0.017***	0.017***	0.030***	0.039***
合作×产出增长		-0.174	-0.421	-0.003	-0.005	-0.045	-0.007	0.002	0.030	-0.004	-1.371	0.017
常量		0.116	0.135***	0.003	0.012	0.048	0.005	0.026	0.098	0.012	1.731	0.018
		-0.009	**-0.005**	0.000	0.000	0.003	0.000	0.000	-0.002	0.000	-0.083	0.000
		0.004**	0.001***	0.000	0.001	0.002	0.000	0.001	0.003	0.000	0.056	0.001
	0.003	0.004	0.005	0.004	0.003	0.004	0.004	0.003	0.003	0.003	0.004	0.002
观测值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国家数量	1,799	1,799	1,725	1,799	1,799	1,799	1,799	1,799	1,799	1,799	1,799	1,799
	79	79	79	79	79	79	79	79	79	79	79	79

来源：世界发展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平衡表，Chinn-Ito（2006），Lane and Milesi-Ferretti（2007）

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国家组。包含时间固定效应的广义最小二乘回归

模型。方括号报告了稳健性的标准错误。其因变量是人均消费的特殊增长 $(\Delta c_{t+1}^{j} - \Delta c_{t+1})$。估值基于公式（2）得出。产出增长是指人均 GDP 的特殊增长 $(\Delta y_{t+1}^{j} - \Delta y_{t+1})$。De-jure 指的是 Chinn-Ito（2006）得出的金融一体化度量。合作指的是各自列中的变量占 GDP 的百分比。1990-2018 年或根据可获得的数据而定。*、**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的统计学意义。合作变量的系数和标准差乘以 10^3。

表 4A 汇款、跨境流动、De-jure 的金融开放和国际风险分担

	援助流入	总负债	FDI 负债	投资组合股权负债	债务负债	FDI 流入	投资组合股权流入	债务流入	贸易开放
	(1)	(2)	(3)	(4)	(5)	(6)	(7)	(8)	(9)
产出增长	0.869	0.825	0.824	0.815	0.827	0.826	0.829	0.828	0.828
	0.031***	0.032***	0.032***	0.033***	0.032***	0.031***	0.031***	0.031***	0.044***
汇款流入	-0.166	-0.185	-0.168	-0.198	-0.187	-0.165	-0.172	-0.169	-0.207
	0.120	0.121	0.120	0.123	0.120	0.120	0.120	0.120	0.124*
汇款×产出增长	**-0.008**	**-0.009**	**-0.009**	**-0.009**	**-0.009**	**-0.010**	**-0.009**	**-0.009**	**-0.009**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合作	-0.353	-0.004	-0.007	-0.062	-0.007	0.003	0.035	-0.004	0.027
	0.137**	0.003	0.012	0.049	0.005	0.026	0.099	0.012	0.018
合作×产出增长	**-0.005**	0.000	0.000	0.003	0.000	0.000	-0.002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2	0.000	0.001	0.003	0.000	0.001
De-jure 集合	-0.001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De-jure×产出增长	-0.082	-0.069	-0.063	-0.064	-0.066	-0.055	-0.073	-0.064	-0.078
	0.057	0.059	0.060	0.058	0.059	0.058	0.058	0.059	0.060
观测值	0.006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国家数量	1,725	1,799	1,799	1,799	1,799	1,799	1,799	1,799	1,799
	79	79	79	79	79	79	79	79	79

来源：世界发展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平衡表，Chinn-Ito（2006）, Lane and Milesi-Ferretti（2007）

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国家组。包含时间固定效应的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方括号报告了稳健性的标准错误。其因变量是人均消费的特殊增长 $(\Delta c_{t+1}^{j} - \Delta c_{t+1})$。估值基于公式（2）得出。产出增长是指人均 GDP 的特殊增长 $(\Delta y_{t+1}^{j} - \Delta y_{t+1})$。De-jure 指的是 Chinn-Ito（2006）得出的金融一体化度量。合作指的是各自列中的变量占 GDP 的百分比。1990-2018 年或根据可获得的数据而定。*、**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的统计学意义。汇款流入和合作变量的系数和标准差乘以 10^3。

表 4B 外国援助、跨境资金流动、De-jure 金融开放和国际风险分担

	汇款流入	总负债	FDI 负债	投资组合股权负债	债务负债	FDI 流入	投资组合股权流入	债务流入	贸易开放
	(1)	(2)	(3)	(4)	(5)	(6)	(7)	(8)	(9)
产出增长	0.869	0.835	0.842	0.843	0.839	0.848	0.850	0.848	0.857
	0.031***	0.032***	0.031***	0.032***	0.032***	0.030***	0.030***	0.030***	0.043***
援助流入	-0.353	-0.378	-0.403	-0.430	-0.365	-0.414	-0.413	-0.417	-0.416
	0.137**	0.137***	0.135***	0.136***	0.139***	0.135***	0.135***	0.136***	0.135***
援助流入×产出增长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6**	**-0.005**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合作	-0.166	-0.006	-0.006	-0.037	-0.009	-0.007	0.052	-0.03	0.028
	0.120	0.005	0.013	0.043	0.006	0.021	0.106	0.0160*	0.018
合作×产出增长	**-0.008**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003	0.001	0.000
	0.004**	0.000	0.001	0.002	0.000	0.001	0.003	0.000*	0.001
De-jure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De-jure×产出增长	-0.082	-0.083	-0.080	-0.084	-0.085	-0.088	-0.089	-0.090	-0.087
	0.057	0.057	0.057	0.056	0.057	0.056	0.056	0.057	0.057
常量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5
	0.004*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观测值	1,725	1,725	1,725	1,725	1,725	1,725	1,725	1,725	1,725
国家数量	79	79	79	79	79	79	79	79	79

来源：世界发展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平衡表，Chinn-Ito（2006）, Lane and Milesi-Ferretti（2007）

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国家组。包含时间固定效应的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方括号报告了稳健性的标准错误。其因变量是人均消费的特殊增长 $(\Delta c_{t+1}^{j} - \Delta c_{t+1})$。估值基于公式（2）得出。产出增长是指人均 GDP 的特殊增长 $(\Delta y_{t+1}^{j} - \Delta y_{t+1})$。De-jure 指的是 Chinn-Ito（2006）得出的金融一体化度量。合作指的是各自列中的变量占 GDP 的百分比。1990-2018 年或根据可获得的数据而定。*、**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的统计学意义。援助流入和合作变量的系数和标准差乘以 10^3。

表 5 汇款、外国援助、跨境资金流动和国际风险分担

	总负债	FDI 负债	投资组合股权负债	债务负债	FDI 流入	投资组合股权流入	债务流入	贸易开放
	(1)	(2)	(3)	(4)	(5)	(6)	(7)	(8)
产出增长	0.856	0.863	0.864	0.860	0.868	0.870	0.868	0.877
	0.033***	0.032***	0.033***	0.033***	0.031***	0.031***	0.031***	0.043***
汇款流入	-0.172	-0.162	-0.193	-0.179	-0.166	-0.164	-0.172	-0.215
	0.121	0.120	0.122	0.121	0.120	0.120	0.121	0.124*
汇款×产出增长	**-0.009**	**-0.009**	**-0.008**	**-0.009**	**-0.009**	**-0.009**	**-0.008**	**-0.008**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援助流入	-0.313	-0.343	-0.369	-0.300	-0.352	-0.352	-0.355	-0.357
	0.139**	0.137**	0.137***	0.142**	0.137**	0.137**	0.138**	0.137***
援助流入×产出增长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6**	**-0.005**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合作	-0.006	-0.007	-0.046	-0.009	-0.006	0.058	-0.028	0.036
	0.005	0.013	0.043	0.006	0.021	0.107	0.016*	0.019*
合作×产出增长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3	0.001	0.000
	0.000	0.001	0.002	0.000	0.001	0.003	0.000	0.001
De-jure 集合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De-jure×产出增长	-0.073	-0.070	-0.077	-0.076	-0.078	-0.080	-0.081	-0.081
	0.059	0.058	0.057	0.058	0.058	0.057	0.058	0.058
常量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4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观测值	1,725	1,725	1,725	1,725	1,725	1,725	1,725	1,725
国家数量	79	79	79	79	79	79	79	79

来源：世界发展指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平衡表，Chinn-Ito（2006）, Lane and Milesi-Ferretti（2007）

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国家组。包含时间固定效应的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方括号报告了稳健性的标准错误。其因变量是人均消费的特殊增长 $(\Delta c_{t+1}^{j} - \Delta c_{t+1})$。估值基于公式（2）得出。产出增长是指人均 GDP 的特殊增长 $(\Delta y_{t+1}^{j} - \Delta y_{t+1})$。De-jure 指的是 Chinn-Ito（2006）得出的金融一体化度量。合作指的是各自列中的变量占 GDP 的百分比。1990-2018 年或根据可获得的数据而定。*、**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的统计学意义。援助流入和合作变量的系数和标准差乘以 10^3。

本文原题名为“What Types of Capital Flows Help Improve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作者为 Ergys Islamaj 和 M. Ayhan Kose。Ergys Islamaj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的高级经济学家，拥有乔治敦大学博士学位。加入世界银行之前，他曾是瓦萨学院的助理教授。M. Ayhan Kose 为是世界银行公平增长、金融与制度（EFI）代理副行长，EFI 首席经济学家兼预测局局长。本文于 2021 年 11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教育与创新的鸿沟

Song Ma & Barbara Biasi /文 薛懿/编译

导读：高等教育项目对创新和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本文介绍了教育与创新之间的鸿沟，这是一个衡量教育内容与知识前沿之间距离的指标。在美国高等教育院校中，由更积极地开展研究的教师教授的课程，其教育与创新的差距明显更小。而在学生社会经济地位大多较低的学校中，这一差距更大。平均而言，接触前沿知识与学生成绩呈正相关。编译如下：

高等教育项目在传播前沿知识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这对创新和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Jones 2005, Goldin and Katz 2010, Jones 2009）。通过课程设置，高等教育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培养未来的创新者，尤其是在一个越来越难找到新想法的世界中（Bloom et al. 2017）。然而，这些课程在收入（Hoxby 2020, Mountjoy and Hickman 2020）和创新率（Bell et al. 2019）等学生表现方面存在差异很大。

我们认为，高等教育课程在为学生提供前沿知识方面具有不同能力。这些差异是由学校和教师层面的特征共同决定的，它们可能对劳动力市场结果、教育选择和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

衡量高等教育内容的新数据和新方法

在 Biasi and Ma（2022）中，我们汇集了新数据和新方法来衡量美国院校的高等教育课程在多大程度上涵盖了前沿知识（即最近产生的知识）。将现代文本分析技术应用于课程大纲（度量课程内容）和学术出版物（度量知识前沿）的大样本数据库，我们建立了一个新指标“教育与创新差距”。教育与创新差距旨在捕捉教育内容与前沿知识之间的距离。具体来说，我们将差距定义为课程内容与旧年份知识（几十年前发表的文章内容）以及课程内容与前沿知识（最新文章内容）之间的相似性之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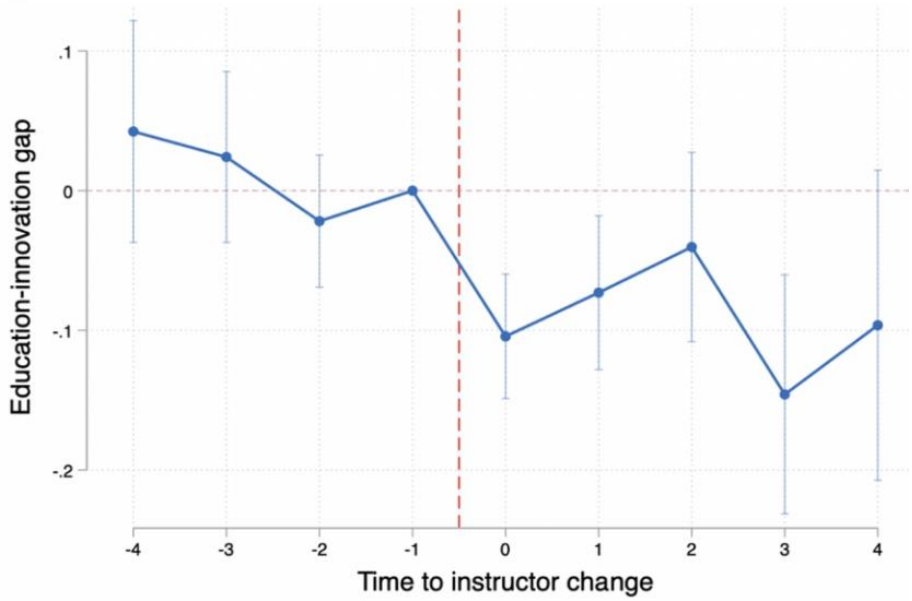
当然，对于包含更多较旧（而不是较新）知识的教学大纲，差距就会更大。例如，在 2020 年教授 Visual Basic（一种相对过时的编程语言）的计算机课将比教授 Julia（一种较新的编程语言）的课程有更大的差距，因为 Visual Basic 主要来自旧文章，而 Julia 来自最近的文章。

研究不同课程之间教育与创新差距的变化，可以发现，在学校之间和学校内部，教育内容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要将教学大纲从差距分布的第 25 百分位移动到第 75 百分位，大约需要将一半的内容替换为新知识。

教师在塑造课程内容方面至关重要

可观察到的教育创新差距大多来自学校内部，在不同的教师教授的课程之间（约四分之一）。教师的影响也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代表性课程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稳定，但当课程的教师发生变化时，差距会显著下降。

图 1 事件研究：教师变化与教育创新差距



注：研究控制课程和专业-年份固定效应。观测值是课程和年份层面的。本文研究对象为最多更换两次讲师的课程。标准误聚类在课程层面。

大多数高等教育教师将时间和精力在教学和研究之间分配，反映出大学承担着生产和传播知识的双重使命。由于时间有限，这些任务通常被视为相互竞争的（Hattie and Marsh 1996, Courant and Turner 2020）。然而，高等教育的性质也可能在两者之间产生互补性（Becker and Kennedy 2005，Arnold 2008）。

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后一种假设：对于由更积极地进行研究（即他们发表的文章更多，被引用的次数更多，获得的资助也更多）的教师教授的课程，教育与创新的差距显著更小。相反，对于专门从事教学的非晋升教师来说，差距更大。当教师自己的研究更接近课程主题时，差距也会更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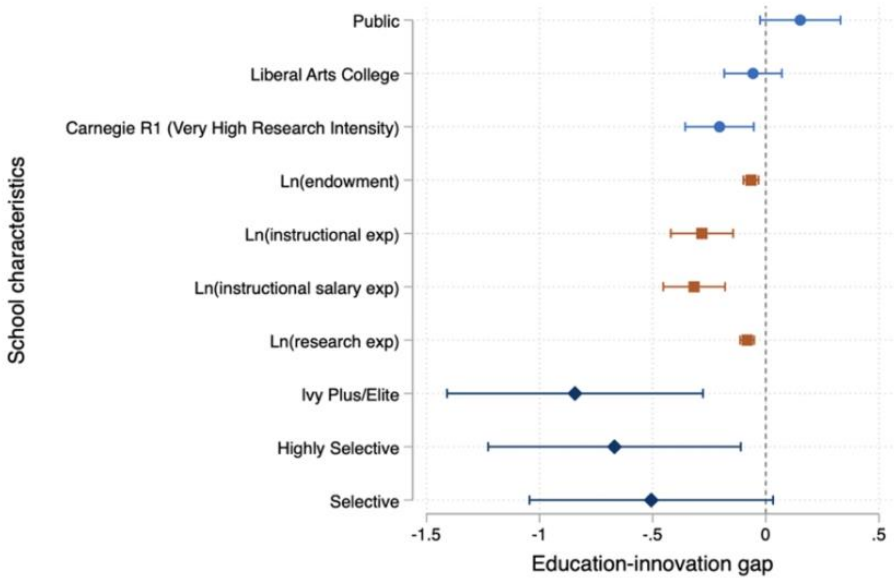
这些结果表明，适合的教师资源配置可以使教育内容更接近前沿知识。此外，对教师研究的投资，包括公共（即政府补贴）和每个高校，可以通过更新教学的形式产生额外的回报。

学校之间具有显著差异

学校内部只解释了总差异的一部分。因此，学校间的差异对于理解高等教育内容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获得前沿知识的途径有何不同是有用的。对于更注重研究（在卡内基分类中排名为 R1）和拥有更多资源（更高的资助以及教学和研究支出）的学校，教育创新差距较小。与非选拔性学校相比，选拔性学校（例如“常春藤+”（Ivy Plus），包括八所常春藤

盟校以及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差距也更小。要使非选拔性学校的平均教学大纲与常春藤+学校的平均教学大纲相当，8%的内容必须替换为新知识。

图 2 教育创新差距与学校特征



注：OLS 估计值以及 95%的置信区间控制了专业-课程和年级-年份固定效应。每个估计值都是通过单独回归获得的，除了选拔性层级（Ivy Plus/Elite, Highly Selective, Selective），它们是联合估计得到的。资助、支出和少数股权均为 2018 年，取自综合高等教育数据系统。估计值是通过汇总 1998 年至 2018 年的教学大纲数据获得的。标准误聚类在学校层面。

重要的是，学校之间的差异会导致不同背景的学生在获取最新知识方面的差异。在招收父母收入中位数较低学生和黑人或西班牙裔学生比例较高的学校中，教育与创新的差距明显更大。

原则上讲，造成这些差异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学校之间教育内容的“垂直差异”。如果能力更强的学生进入更具选拔性或资金更充足的学校（Chetty et al. 2020），并且更有能力吸收最新内容，那么不同学校间的教育创新差异可能只是反映了学校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定制教育内容所做的努力。但我们没有发现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当我们使用录取学生的 SAT 和 ACT 分数来控制学生的能力时，差距与父母收入之间的负相关仍然存在。

课程知识内容的差异与学生的表现有关

这些差异对创新的产生和学生的表现有影响吗？由于学生的表现通常只在学校总水平上可用，我们无法研究前沿知识对学生表现的因果作用。因此，我们选定了学校层面的学生毕业率、收入和创新程度指标，研究其与教育创新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考虑学生被选入每所学校以及与教学相关的学生表现

的其他决定因素，我们控制了大量的学校特征、支出、教学特征、按人群和专业划分的入学率、选拔性和父母背景。

我们发现，在课程教育创新差距较小的学校中，学生更有可能获得博士学位，产生更多专利，毕业后获得更多的收入，并经历更高的代际流动性（Chetty et al. 2014）。他们也更有可能从大学毕业。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参加更多前沿课程会使学生更有动力，从而更有可能完成他们的教育计划。尽管我们的研究方法没有提及某种类型的学校或学生的“最佳”教育创新差距应该是多少，但这些相关性表明，平均而言，接触前沿知识与更好的学生表现有关。

软技能的课程覆盖范围也很重要

虽然教育创新差距衡量的是每门课程的学术内容，但教学大纲中包含的丰富信息使我们能够超越学术内容，探索学生在每门课程中培养的技能。最近的研究发现软技能（塑造人们与他人互动方式的非认知属性）对学生成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Deming 2017，Deming and Kahn 2018）。我们基于小组项目、展示和调查等训练软技能的活动的程度衡量每门课程的“软技能强度”。

我们发现，教育与创新差距较小的课程也往往具有较高的软技能强度。更具选拔性的学校、拥有更多资源的学校以及服务于更具社会经济优势学生的学校会教授更多的软技能密集型课程。在学校内，积极研究的教师最有可能教授软技能强化课程。最后，软技能强度与学生成绩呈正相关。

总结和未来研究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记录了高等教育课程中前沿知识覆盖范围的差异，这是大学和教师之间异质性的一个新的重要维度。通过分析教育与创新的差距，我们对创新和高等教育相关的一些最核心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未来的工作将进一步阐明教师作为知识生产者（以研究形式）和传播者的作用，并调查高等教育中前沿知识的覆盖范围与学生未来生活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原题名为“The Education－Innovation Gap”。本文作者 Song Ma 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SOM）金融学助理教授，也是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教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司金融、创业金融、创新、产业组织、反垄断和商业法。Barbara Biasi 是 SOM 经济学助理教授，也是 NBER 的教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致力于教育、不平等和创新。
本文于 2022 年 5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数字平台的“微捐赠”

Eric Ziou, Jianwei Xing, Jintao Xu, Xiheng Jiang/文 熊春婷/编译

导读：“微捐赠”——一种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筹款模式——它允许慈善机构向许多个人征集小额捐款来筹集资金。本专栏使用阿里巴巴慈善捐赠计划的数据来评估微捐赠的可行性和参与者的潜在动机。作者识别了支撑微捐赠获得成功的各个因素：一是预期捐赠金额和寻找合适捐款项目的成本很低，二是捐赠者进行再次捐赠的比例很高，三是认可机制为捐赠者创造了小而有意义的激励。编译如下：

在过去的十年里兴起了一种“微捐赠”的慈善筹款方法，互联网技术使得在线募集小额捐款成为可能。传统的慈善筹款活动通常依赖于少数捐助者的大额捐款，这一概念弥补了传统慈善筹款活动的不足。研究表明，如果预期捐赠金额较低，个人更有动力捐款（Karlan and List 2007， Meier 2007， Spencer et al. 2009， List 2011， Meer 2014）。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大多数小额捐赠行为往往规模较小，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即“微捐赠”是否可以在拥有庞大用户群、巨大交易量、强大产品竞争以及众多旨在减少摩擦的中介数字平台上扩大规模呢？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Jiang et al. 2022）中，我们通过分析首个将“微捐赠”整合到大型数字平台的项目来研究上述问题：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在线平台，拥有约 5 亿用户。阿里巴巴卖家可以加入该平台的“公益商品”计划（中文为“公益宝贝”，以下简称为公益宝贝项目），该项目允许参与者订阅慈善项目的产品，然后，随着交易的发生，捐款会自动从产品的销售收入中扣除。对于关联产品的每笔交易，默认的最低捐赠金额为 0.02 元（2022 年为折合为 0.003 美元）。

我们使用 2018 年至 2020 年的数据，分析该计划的筹款效果以及订阅该慈善项目产品的卖家的动机。这些数据随机选择了 400,000 名参与该慈善项目的卖家、这些卖家的月销售记录、购买了公益宝贝产品的约超过 2.6 亿名消费者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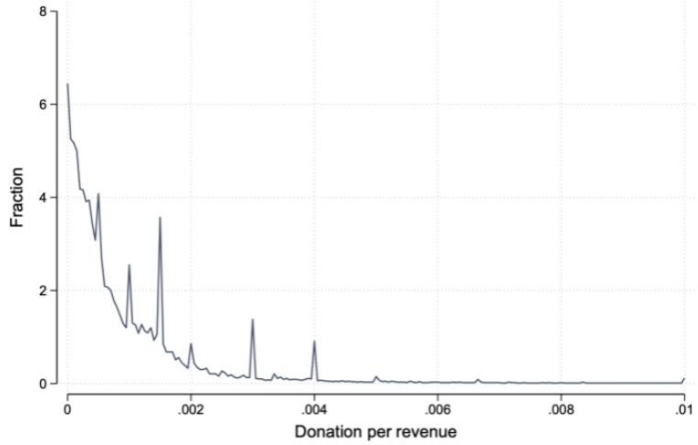
一、公益宝贝项目的执行效果

我们首先分析了公益宝贝项目在实现其首要目标方面的功效：在不给任何捐赠者带来重大负担的情况下产生捐赠。图 1A 显示了每笔交易的捐赠金额与收入的比率（即捐赠率）。贡献率中位数为每元收入捐赠 0.0005 元（即捐赠率为 0.05%），超过 95%的产品捐赠率低于 0.4%。图 1B 总结了卖方年度总捐赠率。该数字呈指数模式，大型卖家的贡献不成比例地高于小卖家：收入最高的 5%卖家平均每年捐赠 1,263 元人民币，相当于其余 95%卖家的总和。尽管每笔交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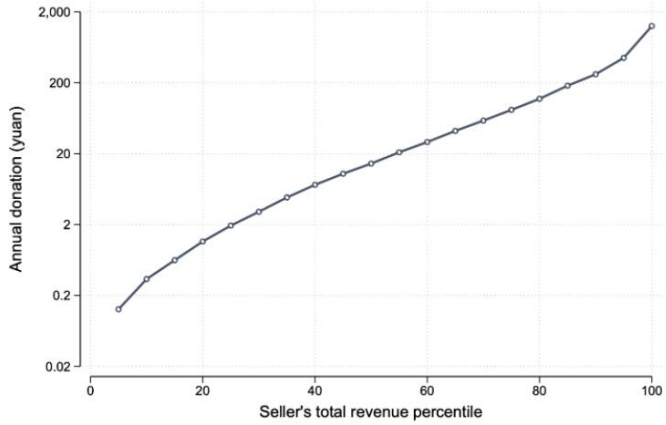
捐赠金额都很低，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卖家加入该慈善项目，捐款总额在逐年增长；在 19 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捐款总额保持在 4 亿元以上（见图 1C）。

图 1 公益宝贝项目的筹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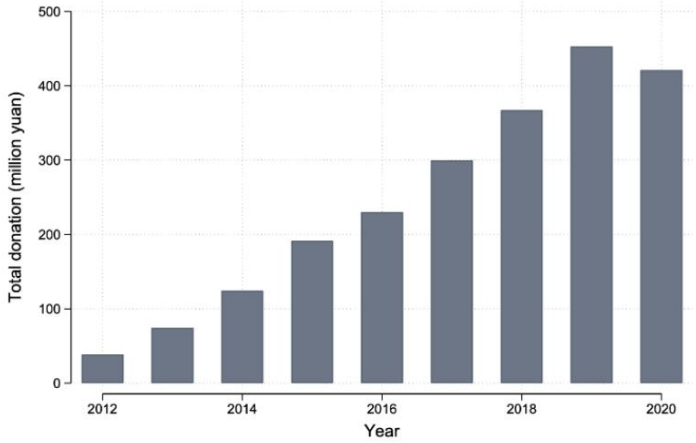
A) 每单位收入的捐赠



B) 按收入百分位数划分的每位卖家平均年度捐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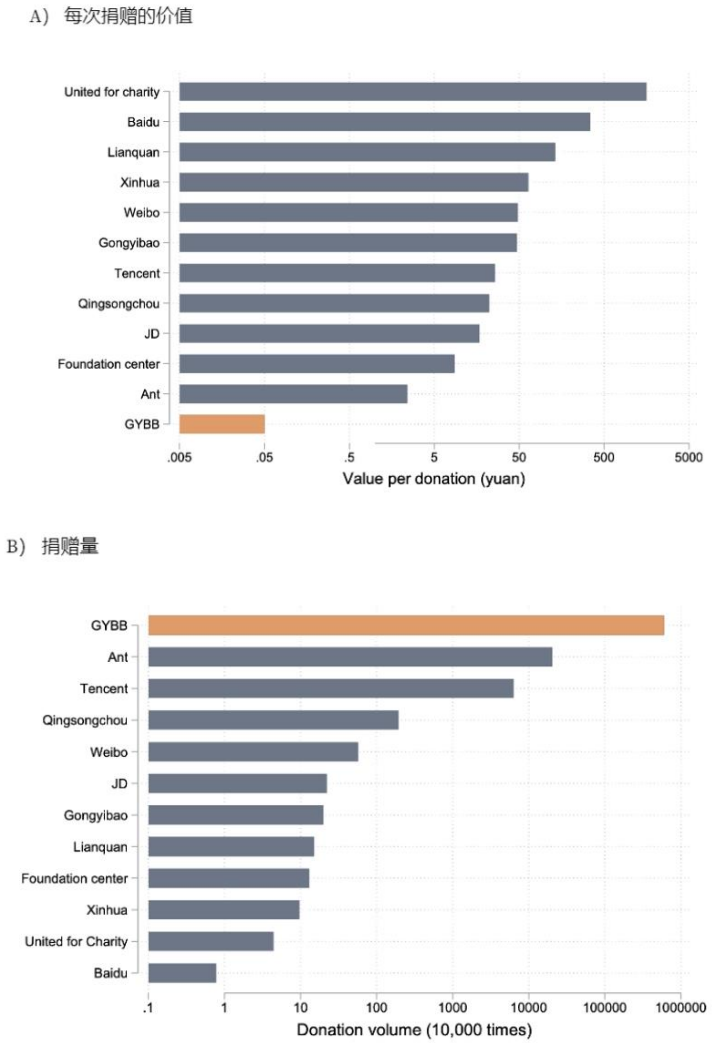
C) 产生的全平台捐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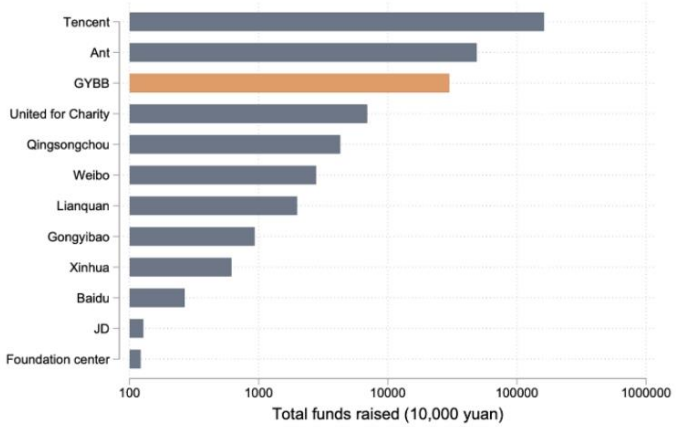
注：图 A 绘制了所有公益宝贝项目中每单位（人民币）收入的捐赠分布。中位数为每元交易收入捐赠 0.0005 元（平均值=0.0017 元）。图 B 绘制了按年收入分配的用户平均捐赠额。例如，收入分配前 5%的普通用户因参与慈善项目而平均每年捐赠 1,263 元人民币。图 C 绘制了该慈善计划在全平台的捐款总额。研究期跨度为 2018-2020 年，汇总统计数据由阿里巴巴提供。

然后，我们进行了两组比较分析，将公益宝贝小额捐赠项目的表现与其他采用更传统的方法的在线筹款项目进行了对比。2017 年我们首次使用跨平台统计数据，将公益宝贝慈善项目与在中国有资格进行在线捐款的其他 11 个平台进行比较，这些平台都没有采用市场整合方法。如图 2 所示，通过公益宝贝项目进行筹款单次捐款金额最低（每次捐赠 0.05 元），但捐款频率最高（全年捐赠 60 亿元），在慈善项目总金额中排名第三（2017 年为 3 亿元）。

图 2 与其他 11 个在线筹款平台进行比较



C) 产生的总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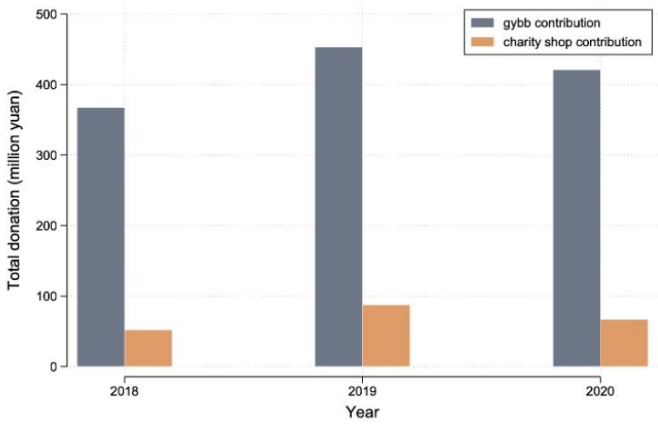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慈善时报》，反映 2017 年的情况。图 A 绘制了每次捐赠的平均值。图 B 绘制了当年的总捐赠量。C 图绘制了筹集的慈善资金总额。轴采用对数刻度以提高可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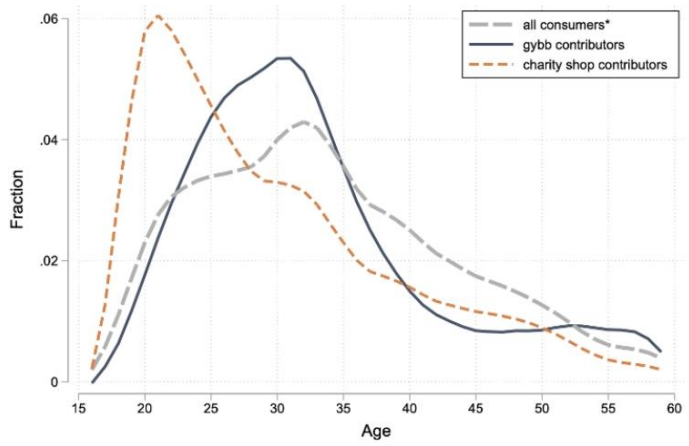
通过与阿里巴巴在同一平台上运营的另一个慈善筹款项目“在线慈善商店”进行比较，也可以看出通过公益宝贝项目进行“微捐赠”的好处。“在线慈善商店”不销售产品，而是直接接受消费者的捐赠。在图 3 中，我们使用 2018 年至 2020 年约 600 家在线慈善商店的交易数据（即捐赠）进行分析得到如下两个事实：一是“在线慈善商店”筹集的资金少于公益宝贝项目（见图 3A）。二是“在线慈善商店”的捐赠者构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人口群体。图 3B 显示，捐赠者年龄分布严重偏向于年轻人群（21 岁），他们可能对在线慈善事业更感兴趣，但没有多样的捐赠渠道。

图 3 与阿里巴巴网上公益商店对比

A) 捐款总额



B) 贡献者的年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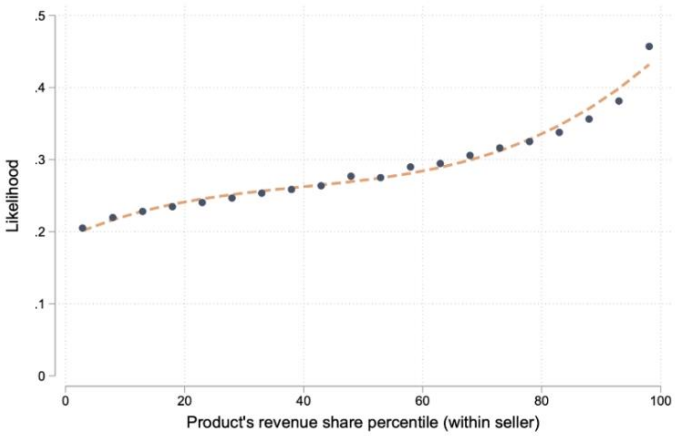
注："所有消费者"包括从所有卖家处有过购买记录的消费者。"慈善商店贡献者"包括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为阿里巴巴在线慈善商店做出贡献的消费者。"公益宝贝贡献者"包括我们研究样本中的所有公益宝贝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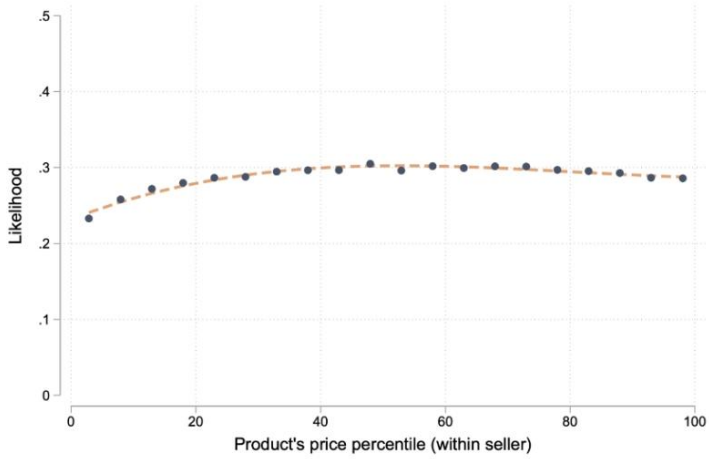
二、卖家的捐赠动机

（一）收入最大化的动机

我们首先将产品被包含在公益宝贝慈善项目中的可能性作为其销售特征函数进行表格制作。对于每个卖家，我们根据收入份额对各个卖家的不同产品进行排名。因此，排名较高的产品是卖家销售更成功的产品和更重要的收入来源。图 4 数据表明，卖家倾向于订阅那些在其总收入中份额更大的产品。收入-份额梯度部分反映了产品的价格差异。为了分离出这个差异，我们重复相同的制表练习，但将公益宝贝订阅量与产品的平均"价格"（每一交易量的收入）进行关联，结果表明在价格方面不存在显著梯度，如图 4 所示。这些证据有助于我们理解卖家为何愿意加入公益宝贝慈善捐赠项目——即他们使用公益宝贝来进一步推广他们最畅销的产品。

图 4 卖家链接到慈善机构的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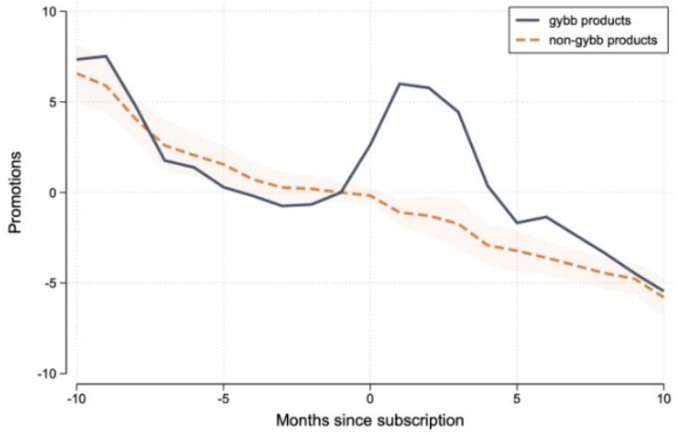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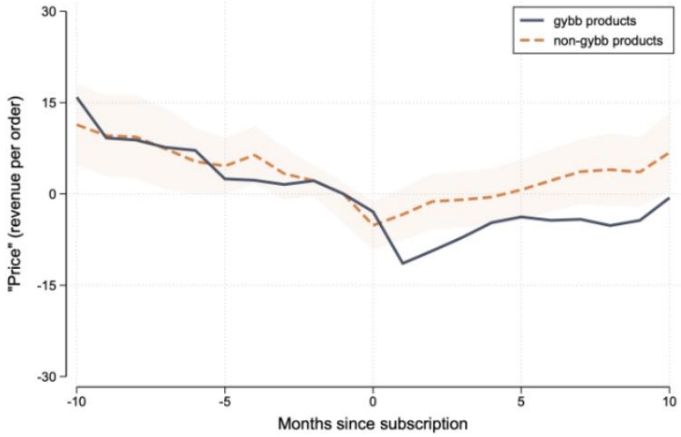
为了进一步了解以这种方式进行捐赠的卖家的潜在动机，我们本着事件研究估计的精神分析了他们订阅公益宝贝项目的时间。图 5 报告了“转换组”（成为公益宝贝项目内的商品）和“比较组”（不是公益宝贝项目内的商品）的估计值。图 5A 显示了当月的价格促销。我们发现，在订阅公益宝贝项目内产品的前几个月里，公益宝贝项目内的产品和项目外的产品的促销活动是同步进行的。然后，订阅公益宝贝项目后该项目内的产品的促销活动急剧增加，而非公益宝贝产品的促销活动则保持平稳。图 5B 显示，订阅后公益宝贝产品的每单位数量的收入指标或“价格”有所下降，这是价格促销增加的预期内结果。图 5C 显示，订阅公益宝贝项目后卖家收入激增，这一模式也与促销活动的动态相呼应。

图 5 卖家的慈善订阅时机具有战略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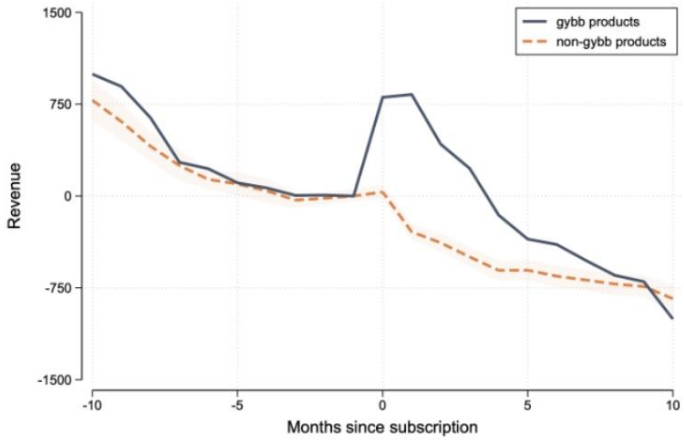
A）促销



B）“价格”（每笔订单的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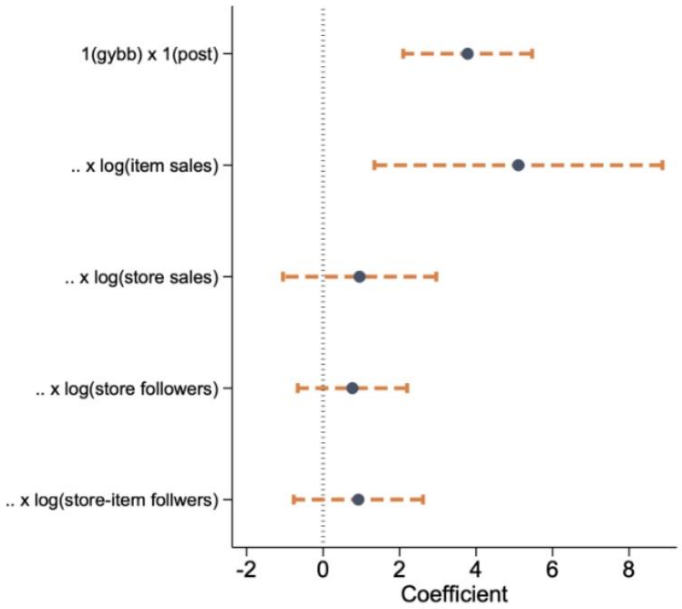


C）收入



上述实验识别了卖家更有可能将哪些产品链接到公益宝贝项目中去。下图6展示了我们的补充分析结果：对于在订阅公益宝贝项目之前销售量就已经很好的产品，在订阅后该产品的促销活动的增加幅度更大。

图 6 卖家在参与公益宝贝后推广哪些商品？



注：每个条形表示来自单独回归的系数。第一行重复了参与公益宝贝后产品促销变化的基线差异估计。其余行显示三向交互系数，其中 1（公益宝贝）x1（post）与产品（或商店）前公益宝贝特征的度量完全交互。“日志（商品销售）”是记录商品的交易总数。“日志（商店销售）”是卖家所有商品的日志交易总数。“日志（商店关注者）”和“日志（商店商品关注者）”是关注卖家或商品的消费者总数。范围条显示使用在卖方级别聚集的标准误差构建的 95%置信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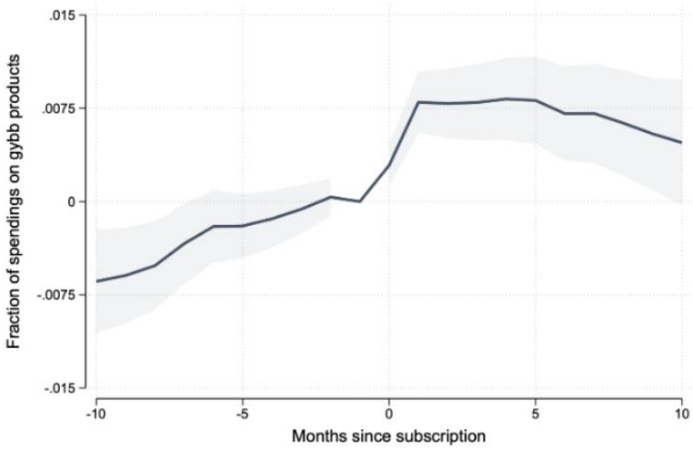
总之，有证据表明，卖家利用公益宝贝慈善项目来推广他们最畅销的产品。收入份额最高的产品更有可能加入公益宝贝慈善计划，在加入公益宝贝后那些销售情况本就很好的产品的促销力度将进一步增大。

（二）“利他主义”效应

成功筹款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能够留住捐助者并鼓励捐助者进行经常性捐款。数据显示，到第十个月末，卖家仅停止对 3.2%的公益宝贝产品进行捐款。在 19 年新冠疫情爆发或出现其他收入冲击期间，公益宝贝项目的订阅量未发生重大变化。为什么卖家不断向该项目捐款？

图 7 中表明在卖家成为公益宝贝项目的捐赠者后，卖家的支出份额显著增加。对于普通的公益宝贝卖家来说，他们的购买习惯发生变化，这一事实表明，利他主义可能是卖家进行捐赠的重要动机之一。

图 7 偏爱慈善行为的证据



注：该图显示了卖家自己阿里巴巴对公益宝贝上市产品的支出份额，相对于其任何产品为公益宝贝做出贡献的第一个月的时间函数。事件月份-1 规范化为零。阴影区域显示使用在卖方级别聚类的标准误差构建的 95%置信区间。

三、结论

对阿里巴巴平台的公益宝贝项目进行分析后，我们得到了一些关于“微捐赠”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其作为慈善筹款新模式成功的基础。首先，公益宝贝项目的预期捐赠金额极低。其次，捐赠者留存率高（即捐赠者愿意进行多次捐赠）。第三，与捐赠相关的搜索成本很低。第四，在线发布参与产品的慈善标签可以为用户参与捐赠提供小而有意义的激励。上述分析揭示了将“微捐赠”整合到其他数字平台的可能性，特别是那些交易频繁、产品竞争激烈的平台。

本文原题名为“Microgiving with Digital Platforms”。本文作者为 Eric Zou, Jianwei Xing, Jintao Xu, Xiheng Jiang。Eric Zou 是俄勒冈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是污染预防经济学。Jianwei Xing 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助理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是环境经济学和产业组织。Jintao Xu 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也是北京大学中国能源与环境经济中心主任，其主要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林权改革评估、工业污染控制政策、低碳经济政策等。Xiheng Jiang 是中国国际知识发展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近期其研究重点是联合国 2030 年议程及其实施，特别是基础设施和数字化的作用。本文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刊于 VOX EU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数字生态系统的全球治理：保持融合和组织共存

Bruno Liebhaberg Pascal Lamy /文 廖世伟/编译

导读：尽管一直有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数字经济全球治理的深度融合，但地缘政治摩擦和国家控制权的重新确立，正推动数字经济细分成为不同的子部分。本专栏概述了提高数字经济的效益和机遇并在全球层面应对监管和治理方面挑战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侧重于在线平台、数据、基础设施和数字贸易的全球治理，并围绕效率、兼容性、弹性和一致性等政策目标进行组织。编译如下：

尽管一直有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数字经济全球治理的深度融合，但地缘政治摩擦和国家控制权的重新确立，正推动数字经济细分成为不同的子部分。本专栏概述了提高数字经济的效益和机遇并在全球层面应对监管和治理方面挑战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侧重于在线平台、数据、基础设施和数字贸易的全球治理，并围绕效率、兼容性、弹性和一致性等政策目标进行组织。

近几十年来，全球数字经济的扩张及其治理的融合为科学进步和全球福利做出了贡献。他们还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深度互联的技术生态系统和供应链。尽管强大的力量仍在推动更深层次的融合，但地缘政治摩擦和国家控制权的重新确立，正朝着分裂成不同的子部分的方向发展。数字生态系统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关联的原则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世界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走向技术脱钩，这将对现代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在主要的地缘政治集团中，分散的或不兼容的数字化或数据密集型跨境系统将是极其昂贵的。金融体系、全球价值链以及全球公共产品、服务和共同空间（包括外层空间、天气管理和民用航空）的管理冻结或失灵可能造成严重破坏。此外，它可能会导致数十年的技术锁定，并产生远远超出技术经济范围的连锁反应。

数字经济的融合与分割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结果不仅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而且对全球力量平衡也至关重要。因此，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停下来考虑一下数字监管、治理和全球化进程的变化，并仔细权衡各种选择。

在此背景下，正如最近在欧洲监管中心（CERRE）来自欧洲、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约 30 位学者和专家共同撰写的一份综合报告所述（Lamy & Liebhaberg 2022），我们相信，数字生态系统全球治理的总体目标应该是保护，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促进融合，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公平竞争环境的好处，并在分歧不可避免时组织共存。

充分、全面的融合既不现实，在许多情况下也不合适。数字监管政策出现一些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必须尊重和照顾各国不同的偏好和优先

事项。但是，如果这些偏好不会让位于市场优化，那么在偏好方面的不灵活性也不应导致不必要的经济福利成本。这两种风险都必须避免。从相对开放的跨境数字经济中获得和分享的利益，应与对公共政策目标的适当保护仔细平衡。

这里必须区分脱钩和分化。脱钩是对技术产品、服务和投入在国家和大陆之间流动方式的主动限制。它涉及广泛使用技术限制：出口管制、撤资令、许可证拒绝、签证禁令和制裁。

分歧是指各具特色的国家或地区法规以不协调的方式积累起来，每个法规都响应特定的集体偏好。在这方面，分歧不是一个绝对的、二元的“是与否”概念；它是相对的，其评估将基于它所施加的合规成本。

脱钩主要发生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而分歧则发生在各个层面（例如跨大西洋框架中的隐私）。然而，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界限有时可能很模糊。这是由于贸易限制的原因并不总是明确的，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扩大的国家安全定义，因此可能超出了 WTO 框架的国家安全例外。

在这两种情况下，主要的数字化或数据密集型跨境系统之间的分割将是极其昂贵的。金融体系、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公共产品管理（包括太空、天气和民用航空）的冻结或失灵可能造成严重破坏。

鉴于上述脱钩趋势，有必要对根本性的政策选择进行适当的辩论。分歧往往是众多隐性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更好的治理机制可以减轻任何意想不到的影响。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不应忽视引发螺旋式升级的风险：脱钩措施可能引发一系列报复性措施，并激励行为者先发制人地减少技术联系，以避免未来的成本。

为了提高数字经济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政治利益和机会，并在全球层面应对数字经济在监管和治理方面提出的新挑战，上述 CERRE 报告包含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这些重点是在线平台、数据、基础设施和数字贸易的全球治理。它们围绕四个政策目标进行组织：效率、兼容性、弹性和一致性。

效率

凡是能够以较低的集体偏好成本实现融合的地方，都应寻求这种融合。这意味着重申开放必须是规则，合理的限制是例外。这包括建立程序和协调机制，以促进数字经济的运作和监管，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包括监管机构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效率。

除其他外，效率标题下的具体建议包括：

• 协调对平台实施的透明度措施的国际标准。

• 一项国际协议，规定了开放和非歧视原则，同时承认合法的国家公共政策需要的例外情况。

• 加强现有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国际监管网络，以确保各机构之间更好地交流专业知识和共享机密信息。

• 一份新的 WTO 数字平台参考文件，以巩固有利于竞争的监管。

兼容性

多年来，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贸易限制被认为不在世贸组织的管辖范围之内。然而，近年来，基于这一理由采取的措施和构成贸易壁垒的措施的数量和范围有所增加。出于国家安全原因的贸易限制应尽可能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协调一致。此外，必须积极寻求和优先考虑所有允许不融合的系统兼容的因素，以使双方利益最大化。

有一些令人鼓舞的例子，例如充分性方法，使得在偏好略有不同的区块之间的交换中保持高度的开放性成为可能，例如在非个人数据的隐私方面。这也意味着，如果全球标准可以脱离价值观，那么就要在技术层面上保持这些标准；并预测未来的监管问题，以确定和弥合未来可能的分歧。

弹性

跨国数字基础设施的稳定性是数字生态系统运行的先决条件。然而，这些基础设施在结构上仍然很脆弱，受到越来越大的进攻压力。有关运营商互操作性、在网络中断时无线网络之间的快速切换、关键设备的审批程序以及海底电缆的安全加强等一系列措施必须解决这些弱点，并增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的弹性。

一致性

数字经济全球治理不可能建立在单一制度或机构的基础上。它只能是一个“制度综合体”，也就是说，一套松散耦合的制度，在不同的层面上提供一系列涉及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规范。话虽如此，金融体系的一致性需要新的协调场所。在这样一个对全球经济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国际合作显然还不发达。对话往往是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进行的，阻碍了相互竞争的政策目标的适当整合，而国家干预正在成倍增加，却没有一个授权监测和评估其效果的全球机构。

为此，我们建议二十国集团 G20 设立数字稳定委员会。该论坛的设计类似于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将聚集来自各国政府（包括安全机构）、地区性机构、负责数字隐私、消费者保护、金融和竞争的监管机构、行业、智库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数字稳定委员会的授权可以如下：

识别、观察和监控技术和监管发展以及业务实践，包括相关的“漏洞”。

识别风险并发现必须做出政策选择的问题；或许，这是在没有任何决策权的情况下确定选择。

每年概述一两次值得进一步辩论和研究的问题。

每年直接向二十国集团报告，为领导人的讨论提供信息。

迈向一个新的数字世界秩序

即使在“带防火墙的全球化”中，世界也应该努力从开放的数字经济中获益。上述建议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这种经济的效益。他们认识到了合理的分歧，以及始终相互作用和经常冲突的增长、竞争、公平和稳定的社会组织、国家安全和道德等目标。

我们相信，全球范围内、规范有序、密集的数据和数字技术交流对于保持技术进步、进一步加快创新速度，从而为应对发展、气候变化、健康和不平等等重大全球挑战提供最佳对策至关重要。

我们的建议并不详尽，当然还需要采取其他行动，但我们相信，这些建议的实施将是迈向数字世界新秩序的重要步骤。

本文原题名为“Global Governance for the Digital Ecosystems： Preserving Convergence and Organising Co-Existence”。本文作者 Bruno Liebhaberg 是智库欧洲监管中心（CERRE）的创始人兼总干事。Pascal Lamy 是巴黎和平论坛主席，目前还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未来区域治理理事会的成员和科尔伯特基金会定向委员会成员。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是非牟利、无党派的美国智库。2006 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PIIE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http://www.piie.com/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 1983 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 28 个国家的 237 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 是 CEPR 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 2005 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 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 大智库中列第 16 名，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9 名，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